

“四维度”分析框架下的新生代农民工阶层流动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教授 陈旭峰

一、文献综述：新生代农民工阶层流动^①回顾与展望

索罗金是西方社会流动研究的现代鼻祖，其《社会流动》一书开创了社会流动研究的现代传统，他的研究代表了“第一代流动研究范式”。Goldthorpe 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社会流动研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了长足的进展。^②与其他研究领域不同，流动研究的突破主要是靠研究方法和模型的创新得以推进，而不是由理论进展带动的。^③原因是社会流动研究本身已经有相当长时间的研究传统和积累，其核心的问题和各种理论早已相对成熟，但缺乏以成熟的模型来分析和检验各种理论观点的真伪。

Blau 提出的“地位获得模型”^④是“第二代流动研究范式”，该范式主要从个体角度探讨地位获得影响因素，在后续研究中该范式被不断丰富，如新结构主义强调结构性因素影响；Granovetter^⑤和 Lin Nan^⑥强调社会资本作用；Bourdieu 非常注重文化资本作用。^⑦在他看来，教育几乎就是优势阶层维持自身地位的隐性工具，出身于上层社会地位的学生，由于其本身已处于上层地位，学校教育对其代内流动却起到了很大的作

① 根据参照系的不同，阶层流动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阶层的代际流动，也就是自身的阶层地位与父代阶层地位的变化情况。另一种是阶层的代内流动，也就是在不同时期自身阶层地位的变化情况，本课题研究是从第一种类型意义上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阶层流动问题的。

② Goldthorpe, John H. 2000. *On Sociology: Numbers, Narrativ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③ Goldthorpe, John H. 2005. “Progress in Sociology: The Case of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in *Analyzing Inequality: Life Chances and Social Mobil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h2), edited by Stefan Svallfor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④ P. M. Blau and O. D.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1967.

⑤ Granovetter, Mark.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60-80.

⑥ Lin, Nan. 1982.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Pp. 131-45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edited by Peter V. Marsden and Nan L. in. Beverly Hills, CA: Sage.

⑦ Bourdieu, Pierre,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用；Giddens 发展了韦伯的阶级概念并进而提出了“阶级结构化”理论。^①该理论就是试图以强调“社会实践”来把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连接起来。在《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一书中，他采用结构化概念来分析当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结构。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要解答，现代社会中的阶级结构和相互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各阶段所具有的某些特征又是如何形成的，因此，他的分析是强调阶级结构的形成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和个人及群体的社会行动，如何构造了阶级结构和它的特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动表分析”技术的发明和成熟^②使社会流动研究进入了“第三代流动研究范式”。^③该范式修正了“地位获得模型”，在技术上排除了产业结构升级和教育扩张的效应，从而纠正了对家庭背景作用分析的低估和曲解。同时在分析中真正实现了对流动模式的直接分析，使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对流动率的粗略考察上。这刺激了大量研究的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 Erikson 等人的《不变的流动性：一个对工业社会阶级流动的研究》。^④Breen 所著的《欧洲的社会流动》一书也是其中的代表作，该书比较了欧洲 11 国代际流动的历史变迁及其异同，是该领域最新的汇总与进展。^⑤还有不少学者对不同历史时期、国家、群体的代际流动进行了比较研究。如 Featherman 等人^⑥对流动机会与机遇的比较研究；Hout^⑦对美国职业结构的比较研究；Ganzeboom 等人^⑧从比较的视角分析了代际的阶层流动；Lee 等人^⑨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变化进行了比较研究。

最近，西方学者们意识到流动表技术对于流动过程分析的不足，于是做了新的改

① Anthong Giddens,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London: Hutchinson, 1973.

② Hauser, Robert M. 1979. "Some Exploratory Methods for Modeling Mobility Tables and Other Cross-Classified Data." Pp.413-58 i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edited by Karl F. Schuessler.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③ Ganzeboom, Harry B. G., D. J. Treiman, and Ultee, Wout C. 1991. "Comparativ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Research 2 Three Generations and Beyond."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277-302.

④ Erikson, Robert and J. H. Goldthorpe. 1992.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⑤ Breen, Richard (Ed.). 2004. *Social Mobility in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⑥ Featherman, David L. and R. M. Hauser. 1978. *Opportunity and Chang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⑦ Hout, Michael. 1988. "More Universalism and Less Structural Mobility: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in the 1980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 6: 1358-1400.

⑧ Ganzeboom, Harry B. G., Ruud Luijkx, and D. J. Treiman. 1989.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8: 3-55.

⑨ Lee, Chul-In, and Gary Solon,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working paper, 2008.

进，^①这又激发起新一轮的研究热潮，“第四代流动研究范式”已经呼之欲出。由此可见，自“二战”后，西方代际流动研究的数据收集质量不断提高，统计分析方法不断创新，至今已经成为社会学中量化程度最高、统计模型最为繁复的领域之一，以至于有研究者认为，现在的代际流动研究已经过于依赖于统计模型与方法的进展，而缺乏理论与视角上的突破，不再能够为更为广阔的社会学核心理论作出贡献，与其他研究领域的交流沟通也受到限制。^②

国内社会学界对代际流动研究有过两次聚焦，“第一次聚焦”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转型时期，这一次聚焦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第二次聚焦”发生在 2000 年前后，由陆学艺牵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对当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推动了国内学术界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研究的一股热潮。此后围绕着当前社会分层结构的现状及其趋势，社会学界形成了不少理论。如陆学艺等人的中产化现代社会理论、孙立平的断裂社会理论、李强和李培林的碎片化理论、李路路的结构化理论等代表性观点。这一时期代表性著作有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③、边燕杰的《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④、段成荣的《中国流动人口研究》^⑤等。十多年以来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基础上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代表性的有来自于对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共同主持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持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的分析和应用。

这一时期代际流动的主流研究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不同历史时期代际流动程度的比较研究。如莫艳清等人基于 2011 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数据，重点分析了 1978 年至 2011 年市场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的总状态与特征，并通过一系列数据模型的推导与分析，揭示了社会成员地位获致和精英阶层继承与选拔的内在机制；^⑥李晚莲的研究指出，职业代际流动不仅会因社会成员的地位不同而产生分化，社会变迁也会对职业代际流动的结构差异产生影响。其通过对不同时期（考察社会变迁中）

① Dessens, J.A.G., W.Jansen, H.B.G.Ganzeboom, and P.G.M.van der Heijden.2003.“Patterns and Trends in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of First Jobs in the Netherlands , 1930-1995.”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66 (1): 63-84.

② Grusky, David (ed.) 2001,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③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④ 边燕杰.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⑤ 段成荣.中国流动人口研究[M].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2.

⑥ 莫艳清, 杨建华.市场转型中的社会流动与内在机制：1978-2011——来自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浙江学刊, 2013 (2) .

差异性的职业代际流动，分析了我国不同时期社会分化在职业代际流动中的表现。^①

第二类是代际流动影响因素研究。主要是从制度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出发来解释代际流动。很多学者强调国家制度性因素是影响代际流动的重要原因，如吴晓刚对城乡间的制度分割给予特别的关注，他的研究发现，农民的代际流动率相当高，城市中的社会流动也具有相当的“开放”性。这种模式是由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造成的。这一制度使得农村中从事非农职业、没有改变户口性质的农民子女还要继续务农，只允许农村中受过很高教育的人获得城市户口；^②很多学者日益关注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如高勇的研究指出，代际流动研究可以分为个体主义取向和结构主义取向。布劳—邓肯模型实质上是个体主义取向的，它描述的是个体通过教育获得地位这样的故事。阶层流动范式更多地带有结构主义的意味，但这种意味却被“社会开放度”等简单化的问题所遮蔽。高勇进一步指出，代际流动研究重要的不只是先赋性还是后致性因素，不只是社会开放度，重要的还有社会结构中的樊篱以及樊篱的变迁问题；^③也有不少关于家庭先赋性因素影响的研究，如吴愈晓使用一个 1996 年收集的全国抽样数据，并结合事件史分析方法（离散时间风险模型），探讨了 1978 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到底是哪些农民能够抓住机会实现经济上的成功并成为农村中的精英阶层，并具体检验了中国农村居民的精英职业地位获得是如何受到他们改革前或解放前的家庭背景影响的；^④多数研究侧重个人因素影响，如王处辉等人的研究认为，高等教育的获得通过增加个体的文化资本，进而成为影响代际流动的最关键因素。^⑤

第三类是关于农民工等特殊职业群体的代际流动研究。如陈辉和熊春文借鉴曼海姆关于代的问题的讨论，根据宏观社会变迁节奏和微观社会经验、思想模式这些决定代际差异的核心要素，对农民工代际划分的框架进行了理论探讨，并尝试提出了一个农民工代际划分的新设想；^⑥秦阿琳的研究指出，农民工的代际流动实质是从农民工向移民转化的问题。随着农民工的代际继替，其城市融入日益分化为“流动者”的融入与“移民”的融入两类人群的问题。这一变迁同时也标志着农民工已经开始由争取“流动权”向争取“移民权”转化，从“流动人口”的群体政治开始向“移民”的群体政

① 李晚莲.社会变迁与职业代际流动差异：社会分层的视角[J].求索，2010（6）.

② 吴晓刚.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J].社会学研究，2007（6）.

③ 高勇.社会樊篱的流动——对结构变迁背景下代际流动的考察[J].社会学研究，2009（6）.

④ 吴愈晓.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J].社会学研究，2010（2）.

⑤ 王处辉，朱焱龙.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机制、变迁及现实[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

⑥ 陈辉，熊春文.关于农民工代际划分问题的讨论——基于曼海姆的代的社会学理论[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治转型；^①李培林等人依据 201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描述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②

另外，不少学者对代际流动的模式与机制进行了诸多创新性探讨。如李煜的研究提出了三种理想类型对应于三种不同的社会类型，分别是（1）依据绩效原则的自由竞争模式，其特征是流动机会按个人能力和贡献分配，对应于完全市场制度的社会。（2）社会不平等结构下的家庭地位继承模式，其特征是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的地位获得有决定性的影响。（3）国家庇护流动模式，其特征是国家通过政策和制度设计，干预社会流动进程，特定的阶层将拥有更多的流动机会、或被剥夺应有的机会；^③周怡的研究在对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作简单铺陈后，重点关注模型之后的改造抑或由它引发的挑战，它包括性别、种族、同期群、政治忠诚、单位地位和网络关系六种视角的研究补充。并指出，后续的对模型的改造，虽然有其客观可信的地位获得因素的因果解释力，但某些视角超越或脱离了通过先赋性和后致性的个体流动机制考察建立起来的布劳—邓肯模型的原初意义。^④

综上所述，国内外研究已经形成一个多视角、多层次研究体系。但该领域还存在新的拓展空间，原因在于：第一，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的代际流动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人口流动可能改变原有代际流动机制，因此，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流动问题，可为如何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提供更清晰解释。第二，如何在代际流动研究中更好把宏观与微观分析结合起来需要更多探讨。宏观与微观结合主要指综合考虑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等因素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宏观研究需要微观分析加以检验，微观研究需要宏观探讨来解释，两者缺一不可。第三，新生代农民工代际流动研究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空间因素。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代际流动机制都存在明显不同，非常有必要研究不同时空条件下的新生代农民工代际流动问题。第四，对新生代农民工代际流动的研究还要深入系统地考察农民工内部分化的影响。农民工内部分化日益加剧，很有必要研究不同类型农民工的代际流动问题，特别是不同层次农民工和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问题。

二、理论基础：新生代农民工阶层流动的机制探讨

这一部分内容主要是综合运用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微观理论来解释在新生代农

① 秦阿琳.从“流动政治”到“移民政治”——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代际变迁[J].中国青年研究, 2013 (8) .

② 李培林, 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J].社会, 2012 (5) .

③ 李煜.代际流动的模式——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J].社会, 2009 (6) .

④ 周怡.布劳—邓肯模型之后：改造抑或挑战[J].社会学研究, 2009 (6) .

民工地位代际流动过程中国家制度性因素、社会结构性因素、家庭先赋性因素、个人自致性因素的作用机制。主要集中三个方面：①不同历史时期比较。分析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深化期“四维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影响的差异；②不同类型流入地比较。分析“四维度”因素对城市流入地、城乡结合部流入地、农村流入地新生代农民工代际流动影响的差异；③不同类型新生代农民工比较。分析“四维度”因素对“经济融入型”、“社会融入型”、“文化融入型”新生代农民工代际流动影响的差异。

（一）国家制度性因素的作用机制

制度因素是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最为重要的约束条件。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说，一种制度及其演变过程，可以用“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进行审视。制度变迁可以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类型。“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一种由国家主导、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制度变迁，而“诱致性制度变迁”则是一种由社会自身主导、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的制度变迁。如果赋予国家和社会以人格与理性，那么，“强制性制度变迁”就是国家人格与理性作用的结果，而“诱致性制度变迁”则是社会人格与理性作用的结果。按照奥地利著名学者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他将人的“我”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种类型，其中，本我是体现自然性的“我”，超我是体现社会性的“我”，而自我是本我与超我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的一个真实的“我”。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相对应，“强制性制度变迁”更多的是表现为超我，是体现国家性的“我”，“诱致性制度变迁”更多的是表现为本我，是体现社会性的“我”。“制度变迁”如何进行取决于“国家性”与“社会性”力量的对比，当“国家性”占据上风时，主要表现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当“社会性”占据上风时，主要表现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征。当然，就像一个人并不会完全按照“本我”的要求来行动，也不会完全按照“超我”的要求来行动，而是根据由“本我”和“超我”共同作用形成的“自我”的要求来行动。现实中的“制度变迁”也会同时具有“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征，只是说，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侧重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个人甚至阶级阶层的社会位置和社会流动机会。制度与政策安排的作用，大到可以直接消灭一个或几个社会阶级阶层（如经 20 世纪 50 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消灭了资产阶级），或者催生出一个或几个阶级阶层（如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鼓励私营经济发展”而导致的新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出现）。当然，制度和政策安排对社

会流动的影响并不总是表现为这种直接的有意干预，有时候会表现为间接的影响。^①受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在我国，国家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往往是根本性的，其表现形式也是非常多的，既有发挥直接作用的制度性因素，诸如户籍制度，也有发挥间接作用的制度性因素，诸如教育制度。可以说，国家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其它因素所不能替代的。

国家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是因时而异、因地制宜和因人而异的。国家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因时而异体现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家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不同的。从大的时期来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一历史时期主要是从我国初步确立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这段时期，这一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受国家制度的严格控制，其社会流动是异常困难的。因此，这一时期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是极少的。可以说，这一历史阶段的国家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地位的代际流动是不利的；第二个历史时期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历史时期主要是从我国 1978 年开始改革开放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这段时期，这一阶段我国进行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农民不断由农村向城市流动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并实现了地位的代际流动。可以说，这一历史阶段的国家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地位的代际流动是有利的；第三个历史时期是在改革开放深化期。这一历史时期主要是从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到现在的这段时期，这一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成熟，国家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制约作用日益明显。可以说，这一历史阶段的国家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地位的代际流动是不利的。

国家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因地制宜体现在：在不同的流入地，国家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不同的。课题组根据流入地区域特征的不同，将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入地分为三种类型：城市、城乡结合部、农村。对于在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国家制度性因素对其影响是最大的，排斥性非常明显，他们不仅受到城市户籍制度的限制，而且不能享受到城市的社会保障。可以说，国家制度性因素对在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地位的代际流动是非常不利的；对于在农村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国家制度性因素对其影响是最小的，他们不仅不会受到城市户籍制度的限制，其它方面的限制也明显要少。可以说，国家制度性因素对在农村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地位代际流动的制约作用是较小的；而对于在城乡结合部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国家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

① 张宛丽.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机制探讨[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4 (8) .

的影响则是介于前两者之间。

国家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因人而异体现在：对于不同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国家制度性因素对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不同的。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的不同，可以将新生代农民工分为“经济融入型”、“社会融入型”、“文化融入型”三种不同的类型。“经济融入型”是指处于经济层面融入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外出务工时间不长，更关注的是如何在流入地实现安身立命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型”是指处于社会层面融入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已经在流入地实现安身立命，更关注的是如何在流入地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更多社会交往的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融入型”是指处于文化层面融入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已经在流入地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关注的是如何更好的认同流入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新生代农民工。比较而言，国家制度性因素对“经济融入型”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最大的，其次是“社会融入型”新生代农民工，影响最小的是“文化融入型”新生代农民工。

（二）社会结构性因素的作用机制

对于城市社区的分布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越多的社区，其资本拥有量往往越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其演变的历程往往是分为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社区当中只有少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以当地居民为主，这一阶段社区的资本还是比较丰富的；第二阶段，社区当中外来人口不断增加，社区当地居民开始搬离社区，这一阶段社区的资本量开始下降；第三阶段，社区外来人口占比越来越高，社区资本量不断减少。这种现象在城乡结合部地区最为普遍，其原因在于：从新生代农民工的角度来说，城乡结合部往往是其居住的首选位置，因为这些地区的生活成本往往较低，务工也较为便利。从社区当地居民的角度来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乡结合部的居民往往可以在城市化进程中获得较大的利益，这种利益有多种获得途径，例如，巨额的拆迁安置赔偿、外来人口的房屋租金等等就是很好的例子。社区当地居民经济资本获得明显提升之后，逐渐产生了搬离原有社区的想法，使得社区原有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不断被抽离。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又不足以弥补社区资本不足这一问题。

可以说，流入地社区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非常好的现实载体，但是，新生代农民工较多的社区已有的资本情况不足以为其地位的代际流动提供支持。首先，从流入地社区经济资本来说，社区的各项配套设施，如社区图书馆、社区健身器材、社区医院、社区活动场所，这些设施的配套都需要社区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本。同样，

对于社区提供就业、住房、帮扶救助等服务来说，也需要社区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本。但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经济资本条件；其次，从流入地社区的社会资本来说，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陌生的，他们的社会资本更多的留在了流出地；最后，从流入地社区的文化资本来说，社区中的文化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已有的文化资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兼容性较差，新生代农民工已有的文化资本反而会对其地位的代际流动形成阻碍作用。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区当中也可以形成新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但是这些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更多的是具有乡村社会特征，与城市社会的相容度较低，这些资本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和传统性特征，对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是不利的。例如，北京的“浙江村”就是非常好的例子，“浙江村”中的外来人口形成了独特的具有较强地域性特征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这些新形成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既不同于城市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也不同于乡村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而是城市和乡村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结合体”，或者也可以叫“变异体”。

社会结构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表现为社会的开放程度。当一个社会的结构是开放的时候，阶层之间的流动渠道是畅通的，此时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而当一个社会的结构是封闭的时候，阶层之间的流动渠道是闭塞的，此时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是比较困难的。第二个方面表现为“手段—目标”的匹配程度。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提出了“手段—目标”论，他认为，社会作为一个文化体系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规定了目标，但是社会在结构的安排上并没有为每一个人提供达到上述目标的合法手段。^①对于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来说，不仅要为人们设置目标，还要让人们能够通过正常的手段实现目标。当手段与目标是匹配的时候，人们能够通过合法的手段来实现目标，此时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当手段与目标不相匹配的时候，人们不能通过合法手段来实现目标，此时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是比较困难的。

当然，对于社会开放程度的判断，我们不能简单的用封闭或者开放来判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春玲对中国社会流动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得出了许多非常有意义的结论，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结论是：“我们发现很难简单地依据流动情况，判断经济改革之前或之后的社会结构哪一个更开放或更封闭，因为，在某些方面社会变得更加开放，而同时在另一些方面社会封闭性又有所发展。这两个方向的变化同时发生，使当前的社会结构变迁表现出复杂性特征”。^②可见，社会结构既具有开放的一面，也

① 王思斌：社会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90.

② 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02.

具有封闭的一面。同时，对于“手段—目标”匹配程度的判断，我们也不能简单的用匹配或者不匹配来判断。从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来说，“手段—目标”可能是匹配的，而从社会结构的另外一些方面来说，“手段—目标”又可能是不匹配的。我们可以将上面的观点归纳为：社会结构性因素中既存在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因素，也存在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因素。

社会结构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是因时而异、因地制宜和因人而异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因时而异体现在：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结构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不同的。以社会的开放程度为例，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社会结构更多的是表现出封闭性，这一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一阶段社会结构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制约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社会结构日渐表现出开放性，这一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是比较容易的。因此，这一阶段社会结构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制约作用是比较小的；在改革开放深化期，我国社会结构的封闭性特征又日渐明显，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又变的日益困难。因此，这一阶段社会结构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制约作用又是非常明显的。

社会结构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因地制宜体现在：在不同类型的流入地地区，社会结构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不同的。以社会的开放程度为例，在城市流入地，社会结构更多的是表现出封闭性，在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要想实现地位的代际流动是非常困难的；农村流入地，社会结构更多的是表现出开放性，在农村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要想实现地位的代际流动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在城乡结合部流入地，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和开放性特征都不明显，在城乡结合部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有机会实现地位的代际流动，另一方面又面临众多的障碍。

社会结构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因人而异体现在：对于不同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社会结构性因素对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不同的。以社会的开放程度为例，对于“经济融入型”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由于他们外出务工时间不长，社会结构对其更多的是表现出封闭性，因此，“经济融入型”新生代农民工要想实现地位的代际流动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对于“文化融入型”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由于他们外出务工时间较长，社会结构对其更多的是表现出开放性，因此，“文化融入型”新生代农民工要想实现地位的代际流动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而对于“社会融入型”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社会结构对其既有开放性的一面，又有封闭性的一面，

因此,“社会融入型”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地位代际流动的难度介于前两者之间。

(三) 家庭先赋性因素的作用机制

家庭先赋性因素主要是指父母所在的家庭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各种资本的拥有情况,资本拥有量越多表明家庭先赋性因素越突出。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础的社会化单元,也同样承付着向下一代提供社会地位资源的功能。社会流动研究最为关注的是父代的各类资源,如职业、教育、权力、单位等对子女社会地位的影响。^①从理论层面来看,自古以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孩子会打洞”的俗语就很好印证了家庭先赋性因素对子女阶层地位代际传递的重要作用,这可以归纳为是一种“阶层复制”或者“阶级再生产”现象。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翼通过对2008年全国性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后发现:以父母亲为表征的家庭背景不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教育获得,而且还影响了人们初次就业职业的阶层地位和现就业职业的阶层地位。这预示着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越高,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也会越高;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越低,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也会越低。^②由此可见,家庭先赋性因素对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不仅已在理论层面得到印证,在实践层面也得到了强有力的验证。

资本概念首先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来的,布迪厄认为,“资本是积累的(以物质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劳动,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质,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物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③布迪厄对资本概念的最重要贡献是对资本的类型学研究。布迪厄把资本分成三种类型——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他认为所谓经济资本就是经济学通常理解的资本类型,指可以直接兑换成货币的那种资本形式,它可以制度化为产权形式。^④对于社会资本,布迪厄是这样来定义的,“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⑤布迪厄

① 李炜.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8).

② 张翼.家庭背景影响了人们教育和社会阶层地位的获得[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4).

③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89.

④ 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84.

⑤ 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2.

认为,所谓文化资本是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①父代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子代地位的代际流动无疑具有重要影响。以文化资本为例,由于精英家庭有更多的文化资本,因此其成员更有能力保持他们的精英等级和统治力。同时,这种文化资本在家庭内进行代际传承,而这正是社会不平等代际再生产的重要原因,即文化的再生产。关于文化资本的作用机制,布迪厄认为,精英家庭通过早期社会化等方式,将外在的财富或社会地位转化为家庭成员的内在部分,成为一种惯习。^②可以发现,父代资本对子代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既具有显性的一面,这是很容易被人们发现的,也具有隐性的一面,这是很难被人们发现的。

家庭先赋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是因时而异、因地制宜和因人而异的。家庭先赋性因素表现为父代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等等,因此,家庭先赋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父代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家庭先赋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因时而异体现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父代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不同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家庭成分成为影响人们地位获得的最重要因素。如果出生于“地富反坏右”这样的家庭,也就注定了其不可能实现地位的代际流动。可以说,这一阶段父代的政治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非常明显;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计划经济不断向市场经济转变,大量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这一阶段父代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以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获得为例,要是没有父代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强力支撑,新生代农民工是很难在城市中找到一份非常好的职业的。可以说,这一阶段父代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非常明显;在改革开放深化期,父代文化资本的重要性不断强化,这一阶段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这直接影响到子代能否更好的认同城市文化和价值观。可以说,这一阶段父代的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非常明显。

家庭先赋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因地制宜体现在:在不同类型的流入地地区,父代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不同的。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在不同类型的流入地地区,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其稀缺的资本类型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在农村流入地稀缺的往往是经济资本,在城乡结合部流入地稀缺的往往是社会资本,而在城市流入地稀缺的往往是文

① 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85.

② 吴愈晓.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J].社会学研究,2010(2).

化资本。因此,比较而言,在农村流入地,父代的经济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更大一些;在城乡结合部流入地,父代的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更大一些;在城市流入地,父代的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更大一些。

家庭先赋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因人而异体现在:对于不同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家庭先赋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不同的。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是有不同层次的,在不同的阶段对需求有不同的侧重,只有满足了低层次的需求之后,人们才会去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因此,对于“经济融入型”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父代的经济资本对其实现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更大;对于“社会融入型”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父代的社会资本对其实现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更大;对于“文化融入型”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父代的文化资本对其实现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更大。

(四) 个人自致性因素的作用机制

国家制度性因素、社会结构性因素和家庭先赋性因素是从宏观和中观两个层面来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在社会研究中,忽略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对微观或个体层面机制的探讨,得出的结论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误导性的。^①因此,从微观或个体层面的自致性因素来探讨农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是不可或缺的。自致性因素是相对于先赋性因素而言的,先赋性是先天赋予的,而自致性是通过个人后天的努力获得的。个人的后致性因素始终是支撑人们社会地位提升的基础性动因。建国以来的50余年时间,无论有何种宏观结构和制度上的变化,个人的后天努力——在计划体制下表现为积极要求政治上的进步,在市场化时代表现为要求努力成才——都会在这些制度规定下,体现个人能力,拓展发展空间。^②当然,个人自致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影响的差异性必然是存在的。

个人自致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是因时而异、因地制宜和因人而异的。与家庭先赋性因素一样,个人自致性因素也可以从资本的角度来进行解读,其直观表现就是个人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等等,因此,个人自致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个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个人自致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因时而异体现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个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不同

① Blalock, Hubert 1991, *Understanding Social Inequality*. Newbury Park, CA: Sage.

② 李炜.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4 (8) .

的。在计划经济时期，政治资本的影响是其它资本类型所没有的。例如，在农村中，党员所占比例非常低，是否具有党员身份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资本对其能否实现地位的代际流动具有重要影响；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特征的逐渐显现，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经济资本的重要性不断突出。同时，在城市化大潮的推动下，很多农村人开始进城务工。对于第一次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进城务工往往是通过亲戚朋友介绍的，个人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因此，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个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有着重要影响；在改革开放深化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个人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个人文化资本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没有较为雄厚的文化资本，是很难实现地位的代际流动的。因此，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发挥着重要作用。

个人自致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因地制宜体现在：在不同类型的流入地地区，个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农村流入地，为了实现地位的代际流动，新生代农民工最为稀缺的往往是经济资本；在城乡结合部流入地，为了实现地位的代际流动，新生代农民工最为稀缺的往往是社会资本；在城市流入地，为了实现地位的代际流动，新生代农民工最为稀缺的往往是文化资本。因此，在农村流入地，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资本对其实现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最大；在城乡结合部流入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其实现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最大；在城市流入地，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资本对其实现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最大。

个人自致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因人而异体现在：对于不同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个人自致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是不同的。从供需理论的角度来说，不同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其需求是有差异的，那么供给则要针对需求的差异而要体现出差异性，实现供需的均衡。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对于“经济融入型”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其更需要的是经济资本，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资本对实现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更大；对于“社会融入型”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其更需要的是社会资本，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实现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更大；对于“文化融入型”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其更需要的是文化资本，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资本对实现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更大。

三、现实基础：新生代农民工阶层流动的比较研究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理论。该理论认为一

个人的地位可以由三个维度来衡量，分别是：经济维度——财富；政治维度——权力；社会维度——声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来说，也是一个城市融入和适应的过程。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相关研究非常多，南京大学的朱力教授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实地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适应状况有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在提出三个层面适应的基础上，朱力认为经济层面上的适应应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收入和住宿；社会层面的适应应考察进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和社交交往；文化层面则考察他们的观念、心理和意愿。^①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过程也是一个市民化过程。农民市民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农民市民化是从与国家、政府相关联的技术层面上推进农民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如受教育权、选举权、居留权、劳动与社会保障权；而广义上的农民市民化更注重从社会、文化层面上转变农民的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和生产生活方式，体现出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要求。^②

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课题组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地位（Y）这一变量操作化为经济地位（Y1）、社会地位（Y2）、政治地位（Y3）、文化地位（Y4）四个指标，进而又将这四个指标进行操作化，从而完成了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这样的变量操作化过程。在此基础上利用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调查对象的性别、文化程度、外出务工年数、流出地发展状况等特征与地位代际流动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比较分析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

本研究以新生代农民工比较密集的 Z 省为调查地点，问卷调查工作在2016年3—5月期间完成。为了使样本更具有代表性，本课题根据地域、年龄和层级三个特征，采用多次分层抽样法抽取新生代农民工样本开展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600份，回收调查问卷535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调查问卷504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84%。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课题组发现：调查对象呈现出在性别上以男性为主，占到了61.1%；在教育程度上以初中居多，占到了调查总体的51.6%；绝大部分（98%）调查对象没有当过村干部；绝大部分（93.1%）调查对象不是中共党员。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

选 项		样本数（人）	比例（%）
性别	男	308	61.1
	女	196	38.9

① 朱力.从流动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看城市适应[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② 吴业苗.居村农民市民化：何以可能——基于城乡一体化进路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社会科学，2010（7）.

选 项		样本数（人）	比例（%）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31	26.0
	初中	260	51.6
	高中	94	18.7
	大专及以上	19	3.8
村干部	当过	10	2.0
	没有当过	494	98.0
中共党员	是	35	6.9
	不是	469	93.1

（一）经济地位的阶层流动

经济地位是最为基础的地位指标，新生代农民工一进入城市，首先面临的的就是能否实现经济地位的代际流动。在借鉴以往研究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征的基础上，课题组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地位（Y1）具体操作化为经济地位（Y11）、收入水平（Y12）、生活条件（Y13）、家庭债务（Y14）、住房条件（Y15）五个指标。通过对这五个指标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简单的描述性分析，课题组发现：对于经济地位（Y11）、收入水平（Y12）、生活条件（Y13）、住房条件（Y15）这四个指标来说，认为与父代差不多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是认为优于父代的比例，认为不如父代的比例是最低的。对于家庭债务（Y14）这个指标来说，认为比父代更少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是认为与父代差不多的比例，认为比父代更多的比例是最低的。

表 2 经济地位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描述性分析
地位（Y）	经济地位（Y1）	经济地位（Y11）	更高（31.6%）；差不多（46.8%）；更低（21.6%）
		收入水平（Y12）	更高（32.7%）；差不多（47.0%）；更低（20.3%）
		生活条件（Y13）	更好（39.3%）；差不多（48.4%）；更差（12.3%）
		家庭债务（Y14）	更少（49.2%）；差不多（31.2%）；更多（19.6%）
		住房条件（Y15）	更好（35.3%）；差不多（42.1%）；更差（22.6%）

1、经济地位的代际变化

通过将调查对象的性别、文化程度、外出务工年数、流出地发展状况等特征与经济地位（Y11）这一指标进行交互分析，课题组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与经济地位（Y11）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38.969$ ， $df=4$ ，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文化程度越高的调查对象经济地位比父代更高的比例越高，经济地位比父代更低的比例越低。这说明：比较而言，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经济地位更高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二，调查对象的外出务工年数与经济地位（Y11）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15.979$ ， $df=4$ ， $Sig=0.003$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外出务工年数越长的调查对象经济地位比父代更高的比例越高，经济地位与父代差不多和比父代更低的比例都越低。这说明：比较而言，外出务工年数越长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经济地位更高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三，调查对象的流出地发展状况与经济地位（Y11）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40.472$ ， $df=4$ ，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流出地发展越好的调查对象经济地位比父代更高的比例越高，经济地位比父代更低的比例越低。这说明：比较而言，流出地发展越好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经济地位更高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四，调查对象的性别与经济地位（Y11）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并不显著。以上四点的具体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 3 与父代相比经济地位变化的显著性群体差异

		经济地位（Y11）		
		更高（%）	差不多（%）	更低（%）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31 人）	16.0	49.6	34.4
	初中（260 人）	31.5	49.2	19.2
	高中及以上（113 人）	49.6	38.1	12.4
	卡方检验 $X^2=38.969$ ， $df=4$ ， $Sig=0.000$			
外出务工年数	不满 5 年（123 人）	20.3	55.3	24.4
	5—10 年（109 人）	25.7	51.4	22.9
	10 年以上（272 人）	39.0	41.2	19.9
	卡方检验 $X^2=15.979$ ， $df=4$ ， $Sig=0.003$			
流出地发展状况	较好（100 人）	49.0	41.0	10.0
	一般（305 人）	31.1	49.2	19.7
	较差（99 人）	15.2	45.5	39.4
	卡方检验 $X^2=40.472$ ， $df=4$ ， $Sig=0.000$			

2、收入水平的代际变化

通过将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外出务工年数、流出地发展状况等特征与收入水平（Y12）这一指标进行交互分析，课题组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与收入水平（Y12）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29.883$ ， $df=4$ ，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文化程度越高的调查对象收入水平比父代更高的比例越高，收入水平与父代差不多和比父代更低的比例

则都越低。这说明：比较而言，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收入水平更高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二，调查对象的外出务工年数与收入水平（Y12）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19.251$ ， $df=4$ ， $Sig=0.001$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外出务工年数越长的调查对象收入水平比父代更高的比例越高。这说明：比较而言，外出务工年数越长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收入水平更高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三，调查对象的流出地发展状况与收入水平（Y12）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36.768$ ， $df=4$ ，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流出地发展越好的调查对象收入水平比父代更高的比例越高，收入水平比父代更低的比例越低。这说明：比较而言，流出地发展越好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收入水平更高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四，调查对象的性别与收入水平（Y12）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并不显著。以上四点的具体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 4 与父代相比收入水平变化的显著性群体差异

		收入水平（Y12）		
		更高 （%）	差不多 （%）	更低 （%）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31 人）	16.8	53.4	29.8
	初中（260 人）	34.2	47.3	18.5
	高中及以上（113 人）	47.8	38.9	13.3
	卡方检验 $X^2=29.883$ ， $df=4$ ， $Sig=0.000$			
外出务工年数	不满 5 年（123 人）	21.1	52.0	26.8
	5—10 年（109 人）	26.6	56.0	17.4
	10 年以上（272 人）	40.4	41.2	18.4
	卡方检验 $X^2=19.251$ ， $df=4$ ， $Sig=0.001$			
流出地 发展状况	较好（100 人）	48.0	46.0	6.0
	一般（305 人）	31.5	49.2	19.3
	较差（99 人）	21.2	41.4	37.4
	卡方检验 $X^2=36.768$ ， $df=4$ ， $Sig=0.000$			

3、生活条件的代际变化

通过将调查对象的性别、文化程度、外出务工年数、流出地发展状况等特征与生活条件（Y13）这一指标进行交互分析，课题组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与生活条件（Y13）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26.939$ ， $df=4$ ，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文化程度越高的调

查对象生活条件比父代更好的比例越高，生活条件与父代差不多和比父代更差的比例则都越低。这说明：比较而言，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生活条件更好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二，调查对象的外出务工年数与生活条件（Y13）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13.862$ ， $df=4$ ， $Sig=0.008$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外出务工年数越长的调查对象生活条件比父代更好的比例越高，生活条件与父代差不多的比例越低。这说明：比较而言，外出务工年数越长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生活条件更好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三，调查对象的流出地发展状况与生活条件（Y13）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47.538$ ， $df=4$ ，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流出地发展越好的调查对象生活条件比父代更好的比例越高，生活条件比父代更差的比例越低。这说明：比较而言，流出地发展越好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生活条件更好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四，调查对象的性别与生活条件（Y13）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并不显著。以上四点的具体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 5 与父代相比生活条件变化的显著性群体差异

		生活条件（Y13）		
		更好 （%）	差不多 （%）	更差 （%）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31 人）	26.7	55.0	18.3
	初中（260 人）	37.7	51.2	11.2
	高中及以上（113 人）	57.5	34.5	8.0
	卡方检验 $X^2=26.939$ ， $df=4$ ， $Sig=0.000$			
外出务工 年数	不满 5 年（123 人）	26.8	57.7	15.4
	5—10 年（109 人）	39.4	52.3	8.3
	10 年以上（272 人）	44.9	42.6	12.5
	卡方检验 $X^2=13.862$ ， $df=4$ ， $Sig=0.008$			
流出地 发展状况	较好（100 人）	57.0	41.0	2.0
	一般（305 人）	36.7	53.1	10.2
	较差（99 人）	29.3	41.4	29.3
	卡方检验 $X^2=47.538$ ， $df=4$ ， $Sig=0.000$			

4、家庭债务的代际变化

通过将调查对象的性别、文化程度、外出务工年数、流出地发展状况等特征与家庭债务（Y14）这一指标进行交互分析，课题组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与家庭债务（Y14）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14.168$ ， $df=4$ ， $Sig=0.007$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文化程度越高的调查对象家庭债务比父代更少的比例越高，家庭债务与父代差不多和比父代更多的比例则都越低。这说明：比较而言，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家庭债务更少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二，调查对象的外出务工年数与家庭债务（Y14）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14.649$ ， $df=4$ ， $Sig=0.005$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与外出务工年数不满 5 年的调查对象比较而言，外出务工年数 5—10 年和 10 年以上的调查对象家庭债务比父代更少的比例明显都要高一些，家庭债务与父代差不多和比父代更多的比例则明显都要低一些。这说明：与外出务工年数不满 5 年的新生代农民工比较而言，外出务工年数 5 年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家庭债务更少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三，调查对象的性别、流出地发展状况等特征与家庭债务（Y14）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都不显著。以上三点的具体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 6 与父代相比家庭债务变化的显著性群体差异

		家庭债务（Y14）		
		更少（%）	差不多（%）	更多（%）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31 人）	39.7	36.6	23.7
	初中（260 人）	48.1	33.1	18.8
	高中及以上（113 人）	62.8	20.4	16.8
	卡方检验 $X^2=14.168$ ， $df=4$ ， $Sig=0.007$			
外出务工年数	不满 5 年（123 人）	35.0	40.7	24.4
	5—10 年（109 人）	52.3	32.1	15.6
	10 年以上（272 人）	54.4	26.5	19.1
	卡方检验 $X^2=14.649$ ， $df=4$ ， $Sig=0.005$			

5、住房条件的代际变化

通过将调查对象的性别、文化程度、外出务工年数、流出地发展状况等特征与住房条件（Y15）这一指标进行交互分析，课题组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与住房条件（Y15）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13.100$ ， $df=4$ ， $Sig=0.011$ ），在 0.05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文化程度越高的调查对象住房条件比父代更好的比例越高，住房条件与父代差不多和比父代更差的比例都越低。这说明：比较而言，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住房条件更好的可

能性也越大；

第二，调查对象的流出地发展状况与住房条件（Y15）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42.643$ ， $df=4$ ，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流出地发展越好的调查对象住房条件比父代更好的比例越高，住房条件比父代更差的比例越低。这说明：比较而言，流出地发展越好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住房条件更好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三，调查对象的性别、外出务工年数等特征与住房条件（Y15）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都不显著。以上三点的具体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 7 与父代相比住房条件变化的显著性群体差异

		住房条件（Y15）		
		更好（%）	差不多（%）	更差（%）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31 人）	24.4	45.0	30.5
	初中（260 人）	36.9	42.7	20.4
	高中及以上（113 人）	44.2	37.2	18.6
	卡方检验 $X^2=13.100$ ， $df=4$ ， $Sig=0.011$			
流出地发展状况	较好（100 人）	55.0	35.0	10.0
	一般（305 人）	33.4	45.9	20.7
	较差（99 人）	21.2	37.4	41.4
	卡方检验 $X^2=42.643$ ， $df=4$ ， $Sig=0.000$			

（二）社会地位的阶层流动

社会地位往往是建立在经济地位基础上的，从理想类型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只有实现了经济地位的代际流动，才有可能进一步去实现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如果连经济地位的代际流动都还没有实现就盲目的去追求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那么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将很有可能成为难以实现的目标。在借鉴以往研究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征的基础上，课题组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地位（Y2）具体操作化为社会地位（Y21）、职业地位（Y22）、社会交往（Y23）、社会关系（Y24）四个指标。通过对这四个指标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简单的描述性分析，课题组发现：对于社会地位（Y21）、职业地位（Y22）这两个指标来说，认为与父代差不多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是认为比父代更低的比例，认为比父代更高的比例是最低的。对于社会交往（Y23）、社会关系（Y24）这两个指标来说，认为与父代差不多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是认为比父代更多的比例，认为比父代更少的比例是最低的。

表 8 社会地位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描述性分析
地位 (Y)	社会地位 (Y2)	社会地位 (Y21)	更高 (19.6%); 差不多 (44.5%); 更低 (35.9%)
		职业地位 (Y22)	更高 (20.8%); 差不多 (46.6%); 更低 (32.6%)
		社会交往 (Y23)	更多 (35.5%); 差不多 (48.3%); 更少 (16.2%)
		社会关系 (Y24)	更多 (32.4%); 差不多 (46.6%); 更少 (21.0%)

1、社会地位的代际变化

通过将调查对象的性别、文化程度、外出务工年数、流出地发展状况等特征与社会地位 (Y21) 这一指标进行交互分析, 课题组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 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与社会地位 (Y21)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显著 ($X^2=26.490$, $df=4$,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 文化程度越高的调查对象社会地位比父代更高的比例越高, 社会地位比父代更低的比例越低。这说明: 比较而言, 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社会地位更高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二, 调查对象的外出务工年数与社会地位 (Y21)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显著 ($X^2=15.817$, $df=4$, $Sig=0.003$),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 与外出务工不满 5 年的调查对象比较而言, 外出务工 5—10 年和 10 年以上的调查对象社会地位比父代更高的比例明显更高一些, 社会地位比父代更低的比例则明显更低一些。这说明: 与外出务工不满 5 年的新生代农民工比较而言, 外出务工 5—10 年和 10 年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社会地位更高的可能性都更大;

第三, 调查对象的流出地发展状况与社会地位 (Y21)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显著 ($X^2=36.885$, $df=4$,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 流出地发展越好的调查对象社会地位比父代更高的比例越高, 社会地位比父代更低的比例越低。这说明: 比较而言, 流出地发展越好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社会地位更高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四, 调查对象的性别与社会地位 (Y21)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不显著。以上四点的具体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 9 与父代相比社会地位变化的显著性群体差异

		社会地位 (Y21)		
		更高 (%)	差不多 (%)	更低 (%)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31 人)	13.7	37.4	48.9
	初中 (260 人)	17.3	46.9	35.8
	高中及以上 (113 人)	31.9	46.9	21.2
	卡方检验 $X^2=26.490$, $df=4$, $Sig=0.000$			

		社会地位 (Y21)		
		更高 (%)	差不多 (%)	更低 (%)
外出务工年数	不满 5 年 (123 人)	11.4	42.3	46.3
	5—10 年 (109 人)	18.3	54.1	27.5
	10 年以上 (272 人)	23.9	41.5	34.6
	卡方检验 $X^2=15.817$, $df=4$, $Sig=0.003$			
流出地发展状况	较好 (100 人)	35.0	44.0	21.0
	一般 (305 人)	16.1	49.2	34.8
	较差 (99 人)	15.2	30.3	54.5
	卡方检验 $X^2=36.885$, $df=4$, $Sig=0.000$			

2、职业地位的代际变化

通过将调查对象的性别、文化程度、外出务工年数、流出地发展状况等特征与职业地位 (Y22) 这一指标进行交互分析, 课题组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 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与职业地位 (Y22)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显著 ($X^2=24.163$, $df=4$,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 文化程度越高的调查对象职业地位比父代更高的比例越高, 职业地位比父代更低的比例越低。这说明: 比较而言, 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职业地位更高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二, 调查对象的外出务工年数与职业地位 (Y22)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显著 ($X^2=9.697$, $df=4$, $Sig=0.046$), 在 0.05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 与外出务工不满 5 年的调查对象比较而言, 外出务工 5—10 年和 10 年以上的调查对象职业地位比父代更高的比例明显更高一些, 职业地位比父代更低的比例则更低一些。这说明: 与外出务工不满 5 年的新生代农民工比较而言, 外出务工 5—10 年和 10 年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职业地位更高的可能性都更大;

第三, 调查对象的流出地发展状况与职业地位 (Y22)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显著 ($X^2=41.696$, $df=4$,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 流出地发展越好的调查对象职业地位比父代更高的比例越高, 职业地位比父代更低的比例越低。这说明: 比较而言, 流出地发展越好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职业地位更高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四, 调查对象的性别与职业地位 (Y22)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并不显著。以上四点的具体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 10 与父代相比职业地位变化的显著性群体差异

		职业地位 (Y22)		
		更高 (%)	差不多 (%)	更低 (%)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31 人)	11.5	43.5	45.0
	初中 (260 人)	20.4	48.8	30.8
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上 (113 人)	32.7	45.1	22.1
	卡方检验 $X^2=24.163$, $df=4$, $Sig=0.000$			
外出务工年数	不满 5 年 (123 人)	12.2	50.4	37.4
	5—10 年 (109 人)	21.1	51.4	27.5
	10 年以上 (272 人)	24.6	43.0	32.4
	卡方检验 $X^2=9.697$, $df=4$, $Sig=0.046$			
流出地发展状况	较好 (100 人)	39.0	41.0	20.0
	一般 (305 人)	18.0	51.5	30.5
	较差 (99 人)	11.1	37.4	51.5
	卡方检验 $X^2=41.696$, $df=4$, $Sig=0.000$			

3、社会交往的代际变化

通过将调查对象的性别、文化程度、外出务工年数、流出地发展状况等特征与社会交往 (Y23) 这一指标进行交互分析, 课题组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 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与社会交往 (Y23)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显著 ($X^2=22.646$, $df=4$,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 文化程度越高的调查对象社会交往比父代更多的比例越高, 社会交往比父代更少的比例越低。这说明: 比较而言, 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社会交往更多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二, 调查对象的外出务工年数与社会交往 (Y23)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显著 ($X^2=8.628$, $df=4$, $Sig=0.071$), 在 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 与外出务工不满 5 年的调查对象比较而言, 外出务工 5—10 年和 10 年以上的调查对象社会交往比父代更多的比例明显更高一些, 社会交往比父代更少的比例则更低一些。这说明: 与外出务工不满 5 年的新生代农民工比较而言, 外出务工 5—10 年和 10 年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社会交往更多的可能性都更大;

第三, 调查对象的流出地发展状况与社会交往 (Y23)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显著 ($X^2=25.349$, $df=4$,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 流出地发展越好的调查对象社会交往比父代更多的比例越高, 社会交往比父代更少的比例越低。这说明:

比较而言，流出地发展越好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社会交往更多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四，调查对象的性别与社会交往（Y23）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不显著。以上四点的具体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 11 与父代相比社会交往变化的显著性群体差异

		社会交往（Y23）		
		更多（%）	差不多（%）	更少（%）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31 人）	23.7	49.6	26.7
	初中（260 人）	36.5	50.0	13.5
	高中及以上（113 人）	46.9	42.5	10.6
	卡方检验 $X^2=22.646$, $df=4$, $Sig=0.000$			
外出务工年数	不满 5 年（123 人）	26.0	52.0	22.0
	5—10 年（109 人）	36.7	50.5	12.8
	10 年以上（272 人）	39.3	45.6	15.1
	卡方检验 $X^2=8.628$, $df=4$, $Sig=0.071$			
流出地发展状况	较好（100 人）	51.0	40.0	9.0
	一般（305 人）	34.4	50.8	14.8
	较差（99 人）	23.2	48.5	28.3
	卡方检验 $X^2=25.349$, $df=4$, $Sig=0.000$			

4、社会关系的代际变化

通过将调查对象的性别、文化程度、外出务工年数、流出地发展状况等特征与社会关系（Y24）这一指标进行交互分析，课题组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调查对象的性别与社会关系（Y24）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8.208$, $df=2$, $Sig=0.017$ ），在 0.05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男性调查对象比父代社会关系更多和差不多的比例都高于女性调查对象，而社会关系更少的比例则明显低于女性调查对象。这说明：比较而言，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比父代更多的可能性大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

第二，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与社会关系（Y24）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22.317$, $df=4$,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文化程度越高的调查对象社会关系比父代更多的比例越高，社会关系比父代更少的比例越低。这说明：比较而言，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社会关系更多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三，调查对象的流出地发展状况与社会关系（Y24）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

验显著 ($X^2=26.888$, $df=4$,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 流出地发展越好的调查对象社会关系比父代更多的比例越高, 社会关系比父代更少的比例越低。这说明: 比较而言, 流出地发展越好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社会关系更多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四, 调查对象的外出务工年数与社会关系 (Y24)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不显著。以上四点的具体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 12 与父代相比社会关系变化的显著性群体差异

		社会关系 (Y24)		
		更多 (%)	差不多 (%)	更少 (%)
性别	男 (308 人)	34.1	49.0	16.9
	女 (196 人)	29.6	42.9	27.6
	卡方检验 $X^2=8.208$, $df=2$, $Sig=0.017$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31 人)	20.6	47.3	32.1
	初中 (260 人)	33.1	48.5	18.5
	高中及以上 (113 人)	44.2	41.6	14.2
	卡方检验 $X^2=22.317$, $df=4$, $Sig=0.000$			
流出地发展状况	较好 (100 人)	51.0	33.0	16.0
	一般 (305 人)	29.8	50.8	19.3
	较差 (99 人)	21.2	47.5	31.3
	卡方检验 $X^2=26.888$, $df=4$, $Sig=0.000$			

(三) 政治地位的阶层流动

中国历来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 在地位的各个维度中, 政治地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因此, 我们也非常有必要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地位的代际流动状况进行分析。在借鉴以往研究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征的基础上, 课题组将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地位 (Y3) 具体操作化为政治地位 (Y31)、参加选举情况 (Y32)、参加选举意愿 (Y33)、参加组织情况 (Y34)、参加组织意愿 (Y35) 五个指标。通过对这五个指标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简单的描述性分析, 课题组发现: 对于政治地位 (Y31)、参加选举情况 (Y32)、参加组织情况 (Y34)、参加组织意愿 (Y35) 这四个指标来说, 认为不如父代的比例是最高的, 其次是认为与父代差不多的比例, 认为优于父代的比例是最低的。对于参加选举意愿 (Y33) 这个指标来说, 认为与父代差不多的比例是最高的, 而认为比父代更弱和认为比父代更强的比例则相差无几。

表 13 政治地位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描述性分析
地位 (Y)	政治地位 (Y3)	政治地位 (Y31)	更高 (13.5%); 差不多 (42.3%); 更低 (44.2%)
		参加选举 (Y32)	更多 (17.8%); 差不多 (36.9%); 更少 (45.3%)
		参加选举意愿 (Y33)	更强 (31.0%); 差不多 (36.9%); 更弱 (32.1%)
		参加组织 (Y34)	更多 (17.4%); 差不多 (36.9%); 更少 (45.7%)
		参加组织意愿 (Y35)	更强 (28.0%); 差不多 (35.0%); 更弱 (37.0%)

1、政治地位的代际变化

通过将调查对象的性别、文化程度、外出务工年数、流出地发展状况等特征与政治地位 (Y31) 这一指标进行交互分析, 课题组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 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与政治地位 (Y31)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显著 ($X^2=12.560$, $df=4$, $Sig=0.014$), 在 0.05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 文化程度越高的调查对象政治地位比父代更高的比例越高, 政治地位比父代更低的比例越低。这说明: 比较而言, 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政治地位更高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二, 调查对象的流出地发展状况与政治地位 (Y31)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显著 ($X^2=39.885$, $df=4$,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 与流出地发展一般和较差的调查对象比较而言, 流出地发展较好的调查对象政治地位比父代更高的比例明显偏高, 而政治地位比父代更低的比例则明显偏低。这说明: 与流出地发展一般和较差的新生代农民工比较而言, 流出地发展较好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地位比父代更高的可能性更大;

第三, 调查对象的性别、外出务工年数与政治地位 (Y31)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都不显著。以上三点的具体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 14 与父代相比政治地位变化的显著性群体差异

		政治地位 (Y31)		
		更高 (%)	差不多 (%)	更低 (%)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31 人)	9.9	35.9	54.2
	初中 (260 人)	12.3	44.2	43.5
	高中及以上 (113 人)	20.4	45.1	34.5
	卡方检验 $X^2=12.560$, $df=4$, $Sig=0.014$			
流出地发展状况	较好 (100 人)	27.0	43.0	30.0
	一般 (305 人)	9.2	47.9	43.0
	较差 (99 人)	13.1	24.2	62.6
	卡方检验 $X^2=39.885$, $df=4$, $Sig=0.000$			

2、参加选举的代际变化

通过将调查对象的性别、文化程度、外出务工年数、流出地发展状况等特征与参加选举（Y32）这一指标进行交互分析，课题组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调查对象的性别与参加选举（Y32）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9.487$ ， $df=2$ ， $Sig=0.009$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男性调查对象比父代参加选举更多和差不多的比例都高于女性调查对象，而参加选举更少的比例则明显低于女性调查对象。这说明：比较而言，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参加选举比父代更多的可能性大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

第二，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与参加选举（Y32）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9.094$ ， $df=4$ ， $Sig=0.059$ ），在 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文化程度越高的调查对象参加选举比父代更多的比例越高，参加选举比父代更少的比例越低。这说明：比较而言，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参加选举更多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三，调查对象的流出地发展状况与参加选举（Y32）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23.042$ ， $df=4$ ，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流出地发展越好的调查对象参加选举比父代更多的比例越高，参加选举比父代更少的比例越低。这说明：比较而言，流出地发展越好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参加选举更多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四，调查对象的外出务工年数与参加选举（Y32）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并不显著。以上四点的具体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 15 与父代相比参加选举变化的显著性群体差异

		参加选举（Y32）		
		更多（%）	差不多（%）	更少（%）
性别	男（308 人）	20.5	39.6	39.9
	女（196 人）	13.8	32.7	53.6
	卡方检验 $X^2=9.487$ ， $df=2$ ， $Sig=0.009$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31 人）	12.2	34.4	53.4
	初中（260 人）	18.1	36.9	45.0
	高中及以上（113 人）	23.9	39.8	36.3
	卡方检验 $X^2=9.094$ ， $df=4$ ， $Sig=0.059$			
流出地发展状况	较好（100 人）	24.0	41.0	35.0
	一般（305 人）	18.4	39.7	42.0
	较差（99 人）	10.1	24.2	65.7
	卡方检验 $X^2=23.042$ ， $df=4$ ， $Sig=0.000$			

3、参加选举意愿的代际变化

通过将调查对象的性别、文化程度、外出务工年数、流出地发展状况等特征与参加选举意愿（Y33）这一指标进行交互分析，课题组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调查对象的性别与参加选举意愿（Y33）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8.078$ ， $df=2$ ， $Sig=0.018$ ），在 0.05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男性调查对象比父代参加选举意愿更强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调查对象，而参加选举意愿更弱的比例则明显低于女性调查对象。这说明：比较而言，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参加选举意愿比父代更强的可能性大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

第二，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与参加选举意愿（Y33）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15.969$ ， $df=4$ ， $Sig=0.003$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文化程度越高的调查对象参加选举意愿比父代更强和与父代差不多的比例都越高，参加选举意愿比父代更弱的比例则是越低。这说明：比较而言，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参加选举意愿更强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三，调查对象的流出地发展状况与参加选举意愿（Y33）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14.134$ ， $df=4$ ， $Sig=0.007$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与流出地发展一般和较差的调查对象比较而言，流出地发展较好的调查对象参加选举意愿比父代更强的比例明显高一些，参加选举意愿比父代更弱的比例则明显低一些。这说明：与流出地发展一般和较差的新生代农民工比较而言，流出地发展较好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参加选举意愿更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第四，调查对象的外出务工年数与参加选举意愿（Y33）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并不显著。以上四点的具体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 16 与父代相比参加选举意愿变化的显著性群体差异

		参加选举意愿（Y33）		
		更强（%）	差不多（%）	更弱（%）
性别	男（308 人）	35.1	36.7	28.2
	女（196 人）	24.5	37.2	38.3
	卡方检验 $X^2=8.078$ ， $df=2$ ， $Sig=0.018$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31 人）	28.2	29.0	42.7
	初中（260 人）	29.2	38.5	32.3
	高中及以上（113 人）	38.1	42.5	19.5
	卡方检验 $X^2=15.969$ ， $df=4$ ， $Sig=0.003$			

		参加选举意愿 (Y33)		
		更强 (%)	差不多 (%)	更弱 (%)
流出地发展状况	较好 (100 人)	40.0	35.0	25.0
	一般 (305 人)	27.5	41.3	31.1
	较差 (99 人)	32.3	25.3	42.4
	卡方检验 $X^2=14.134$, $df=4$, $Sig=0.007$			

4、参加组织的代际变化

通过将调查对象的性别、文化程度、外出务工年数、流出地发展状况等特征与参加组织 (Y34) 这一指标进行交互分析, 课题组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 调查对象的性别与参加组织 (Y34)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显著 ($X^2=8.786$, $df=2$, $Sig=0.012$), 在 0.05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 男性调查对象比父代参加组织更多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调查对象, 而参加组织更少的比例则明显低于女性调查对象。这说明: 比较而言, 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组织比父代更多的可能性大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

第二, 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与参加组织 (Y34)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显著 ($X^2=23.515$, $df=4$,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 文化程度越高的调查对象参加组织比父代更多和与父代差不多的比例都越高, 参加组织比父代更少的比例则是越低。这说明: 比较而言, 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参加组织更多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三, 调查对象的流出地发展状况与参加组织 (Y34)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显著 ($X^2=16.874$, $df=4$, $Sig=0.002$),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 流出地发展越好的调查对象参加组织比父代更多的比例越高, 参加组织比父代更少的比例越低。这说明: 比较而言, 流出地发展越好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参加组织更多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四, 调查对象的外出务工年数与参加组织 (Y34)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不显著。以上四点的具体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 17 与父代相比参加组织变化的显著性群体差异

		参加组织 (Y34)		
		更多 (%)	差不多 (%)	更少 (%)
性别	男 (308 人)	21.4	35.7	42.9
	女 (196 人)	11.2	38.8	50.0
	卡方检验 $X^2=8.786$, $df=2$, $Sig=0.012$			

		参加组织 (Y34)		
		更多 (%)	差不多 (%)	更少 (%)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31 人)	13.0	27.5	59.5
	初中 (260 人)	15.8	38.8	45.4
	高中及以上 (113 人)	26.5	43.4	30.1
	卡方检验 $X^2=23.515$, $df=4$, $Sig=0.000$			
流出地发展状况	较好 (100 人)	24.0	37.0	39.0
	一般 (305 人)	17.0	40.7	42.3
	较差 (99 人)	12.1	25.3	62.6
	卡方检验 $X^2=16.874$, $df=4$, $Sig=0.002$			

5、参加组织意愿的代际变化

通过将调查对象的性别、文化程度、外出务工年数、流出地发展状况等特征与参加组织意愿 (Y35) 这一指标进行交互分析, 课题组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 调查对象的性别与参加组织意愿 (Y35)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显著 ($X^2=9.315$, $df=2$, $Sig=0.009$),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 男性调查对象比父代参加组织意愿更强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调查对象, 而参加组织意愿更弱的比例则明显低于女性调查对象。这说明: 比较而言, 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组织意愿比父代更强的可能性大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

第二, 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与参加组织意愿 (Y35)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显著 ($X^2=18.727$, $df=4$, $Sig=0.001$),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 文化程度越高的调查对象参加组织意愿比父代更强的比例越高, 参加组织意愿比父代更弱的比例则是越低。这说明: 比较而言, 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参加组织意愿更强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三, 调查对象的流出地发展状况与参加组织意愿 (Y35)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显著 ($X^2=19.681$, $df=4$, $Sig=0.001$),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 与流出地发展一般和较差的调查对象比较而言, 流出地发展较好的调查对象参加组织意愿比父代更强的比例明显高一些, 而参加组织意愿比父代更弱的比例则明显低一些。这说明: 与流出地发展一般和较差的新生代农民工比较而言, 流出地发展较好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参加组织意愿更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第四, 调查对象的外出务工年数与参加组织意愿 (Y35)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不显著。以上四点的具体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 18 与父代相比参加组织意愿变化的显著性群体差异

		参加组织意愿（Y35）		
		更强（%）	差不多（%）	更弱（%）
性别	男（308 人）	32.8	33.4	33.8
	女（196 人）	20.4	37.8	41.8
	卡方检验 $X^2=9.315$, $df=2$, $Sig=0.009$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31 人）	22.1	29.0	48.9
	初中（260 人）	25.8	38.8	35.4
	高中及以上（113 人）	39.8	33.6	26.5
	卡方检验 $X^2=18.727$, $df=4$, $Sig=0.001$			
流出地发展状况	较好（100 人）	35.0	36.0	29.0
	一般（305 人）	25.2	40.0	34.8
	较差（99 人）	29.3	19.2	51.5
	卡方检验 $X^2=19.681$, $df=4$, $Sig=0.001$			

（四）文化地位的阶层流动

文化地位的代际流动是这几个地位类型中层次最高的，实现文化地位的代际流动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只有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才能更好的去实现文化地位的代际流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经济、社会和文化这三个层面的地位代际流动是截然分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这三个层面的地位代际流动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都是有着各种各样表现的。只是说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的地位代际流动会有不同的侧重。在借鉴以往研究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征的基础上，课题组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地位（Y4）具体操作化为文化地位（Y41）、看书学习喜好情况（Y42）、参加文化活动情况（Y43）、参加文化活动意愿（Y44）四个指标。通过对这四个指标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简单的描述性分析，课题组发现：对于文化地位（Y41）、参加文化活动情况（Y43）这两个指标来说，认为与父代差不多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是认为不如父代的比例，认为优于父代的比例是最低的。对于看书学习喜好情况（Y42）、参加文化活动意愿（Y44）这两个指标来说，认为与父代差不多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是认为优于父代的比例，认为不如父代的比例是最低的。

表 19 文化地位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描述性分析
地位 (Y)	文化地位 (Y4)	文化地位 (Y41)	更高 (26.0%); 差不多 (44.6%); 更低 (29.4%)
		看书学习喜好情况 (Y42)	更喜欢 (41.8%); 差不多 (43.7%); 更不喜欢 (14.5%)
		参加文化活动情况 (Y43)	更多 (24.0%); 差不多 (44.2%); 更少 (31.8%)
		参加文化活动意愿 (Y44)	更强 (34.8%); 差不多 (44.0%); 更弱 (21.2%)

1、文化地位的代际变化

通过将调查对象的性别、文化程度、外出务工年数、流出地发展状况等特征与文化地位 (Y41) 这一指标进行交互分析, 课题组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 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与文化地位 (Y41)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显著 ($X^2=40.317$, $df=4$,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 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调查对象比较而言,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调查对象文化地位比父代更高的比例明显更高一些, 文化地位比父代更低的比例则明显更低一些。这说明: 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比较而言,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文化地位更高的可能性更大;

第二, 调查对象的外出务工年数与文化地位 (Y41)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显著 ($X^2=13.486$, $df=4$, $Sig=0.009$),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 与外出务工不满 5 年和 10 年以上的调查对象比较而言, 外出务工 5—10 年的调查对象文化地位比父代更高和更低的比例都是最低的, 而文化地位与父代差不多的比例则是最高的。这说明: 与外出务工不满 5 年和 10 年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比较而言, 外出务工 5—10 年的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地位与父代差不多的可能性更大;

第三, 调查对象的流出地发展状况与文化地位 (Y41)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显著 ($X^2=30.963$, $df=4$,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 流出地发展越好的调查对象文化地位比父代更高的比例越高, 文化地位比父代更低的比例越低。这说明: 比较而言, 流出地发展越好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文化地位更高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四, 调查对象的性别与文化地位 (Y41)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不显著。以上四点的具体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 20 与父代相比文化地位变化的显著性群体差异

		文化地位 (Y41)		
		更高 (%)	差不多 (%)	更低 (%)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31 人)	20.6	41.2	38.2
	初中 (260 人)	19.6	48.5	31.9
	高中及以上 (113 人)	46.9	39.8	13.3
	卡方检验 $X^2=40.317$, $df=4$, $Sig=0.000$			
外出务工年数	不满 5 年 (123 人)	22.8	44.7	32.5
	5—10 年 (109 人)	20.2	58.7	21.1
	10 年以上 (272 人)	29.8	39.0	31.2
	卡方检验 $X^2=13.486$, $df=4$, $Sig=0.009$			
流出地发展状况	较好 (100 人)	39.0	43.0	18.0
	一般 (305 人)	23.9	49.2	26.9
	较差 (99 人)	19.2	32.3	48.5
	卡方检验 $X^2=30.963$, $df=4$, $Sig=0.000$			

2、看书学习喜好情况的代际变化

通过将调查对象的性别、文化程度、外出务工年数、流出地发展状况等特征与看书学习喜好情况 (Y42) 这一指标进行交互分析, 课题组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 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与看书学习喜好情况 (Y42)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显著 ($X^2=27.123$, $df=4$,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 文化程度越高的调查对象比父代更喜欢看书学习的比例越高, 比父代更不喜欢看书学习的比例则是越低。这说明: 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更喜欢看书学习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二, 调查对象的外出务工年数与看书学习喜好情况 (Y42)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显著 ($X^2=10.918$, $df=4$, $Sig=0.028$), 在 0.05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 与外出务工 5—10 年和 10 年以上的调查对象比较而言, 外出务工不满 5 年的调查对象比父代更喜欢看书学习的比例明显偏低一些, 而比父代更不喜欢看书学习的比例则是明显偏高一些。这说明: 与外出务工 5—10 年和 10 年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比较而言, 外出务工不满 5 年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更不喜欢看书学习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第三, 调查对象的流出地发展状况与看书学习喜好情况 (Y42) 进行交互分析之后, 卡方检验显著 ($X^2=25.461$, $df=4$,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 流出地发展越好的调查对象比父代更喜欢看书学习的比例越高, 比父代更不喜欢看书学习的比例则是越低。这说明: 比较而言, 流出地发展越好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更喜欢

看书学习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四，调查对象的性别与看书学习喜好情况（Y42）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不显著。以上四点的具体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 21 与父代相比看书学习喜好变化的显著性群体差异

		看书学习喜好情况（Y42）		
		更喜欢（%）	差不多（%）	更不喜欢（%）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31 人）	35.1	39.7	25.2
	初中（260 人）	38.8	48.5	12.7
	高中及以上（113 人）	56.6	37.2	6.2
	卡方检验 $X^2=27.123$, $df=4$, $Sig=0.000$			
外出务工年数	不满 5 年（123 人）	35.0	42.3	22.8
	5—10 年（109 人）	40.4	48.6	11.0
	10 年以上（272 人）	45.6	42.3	12.1
	卡方检验 $X^2=10.918$, $df=4$, $Sig=0.028$			
流出地发展状况	较好（100 人）	54.0	40.0	6.0
	一般（305 人）	40.7	46.6	12.8
	较差（99 人）	33.3	38.4	28.3
	卡方检验 $X^2=25.461$, $df=4$, $Sig=0.000$			

3、参加文化活动情况的代际变化

通过将调查对象的性别、文化程度、外出务工年数、流出地发展状况等特征与参加文化活动情况（Y43）这一指标进行交互分析，课题组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调查对象的性别与参加文化活动情况（Y43）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4.637$, $df=2$, $Sig=0.098$ ），在 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男性调查对象比父代参加文化活动更多的比例略高于女性调查对象，与父代参加文化活动差不多的比例高于女性调查对象，而比父代参加文化活动更少的比例则低于女性调查对象。这说明：比较而言，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参加文化活动比父代更少的可能性大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

第二，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与参加文化活动情况（Y43）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31.422$, $df=4$,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文化程度越高的调查对象参加文化活动比父代更多的比例越高，参加文化活动比父代更少的比例越低。这说明：比较而言，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参加文化活动更多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三，调查对象的流出地发展状况与参加文化活动情况（Y43）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30.299$ ， $df=4$ ，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流出地发展越好的调查对象参加文化活动比父代更多的比例越高，参加文化活动比父代更少的比例越低。这说明：比较而言，流出地发展越好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参加文化活动更多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四，调查对象的外出务工年数与参加文化活动情况（Y43）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并不显著。以上四点的具体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 22 与父代相比参加文化活动变化的显著性群体差异

		参加文化活动情况（Y43）		
		更多（%）	差不多（%）	更少（%）
性别	男（308 人）	24.7	47.1	28.2
	女（196 人）	23.0	39.8	37.2
	卡方检验 $X^2=4.637$ ， $df=2$ ， $Sig=0.098$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31 人）	14.5	40.5	45.0
	初中（260 人）	21.9	47.7	30.4
	高中及以上（113 人）	39.8	40.7	19.5
	卡方检验 $X^2=31.422$ ， $df=4$ ， $Sig=0.000$			
流出地发展状况	较好（100 人）	36.0	46.0	18.0
	一般（305 人）	23.9	45.9	30.2
	较差（99 人）	12.1	37.4	50.5
	卡方检验 $X^2=30.299$ ， $df=4$ ， $Sig=0.000$			

4、参加文化活动意愿的代际变化

通过将调查对象的性别、文化程度、外出务工年数、流出地发展状况等特征与参加文化活动意愿（Y44）这一指标进行交互分析，课题组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与参加文化活动意愿（Y44）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41.869$ ， $df=4$ ， $Sig=0.000$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文化程度越高的调查对象参加文化活动意愿比父代更强的比例越高，参加文化活动意愿比父代更弱的比例越低。这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参加文化活动意愿更强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二，调查对象的外出务工年数与参加文化活动意愿（Y44）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17.686$ ， $df=4$ ， $Sig=0.001$ ），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与外出务工 5—10 年和 10 年以上的调查对象比较而言，外出务工不满 5 年的调查对象参加

文化活动意愿比父代更强的比例是最低的，参加文化活动意愿比父代更弱的比例是最高的。这说明：与外出务工 5—10 年和 10 年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比较而言，外出务工不满 5 年的新生代农民工参加文化活动意愿比父代更弱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第三，调查对象的流出地发展状况与参加文化活动意愿（Y44）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显著（ $X^2=8.877$ ， $df=4$ ， $Sig=0.064$ ），在 0.1 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流出地发展越好的调查对象参加文化活动意愿比父代更强的比例越高，参加文化活动意愿比父代更弱的比例越低。这说明：比较而言，流出地发展越好的新生代农民工比父代参加文化活动意愿更强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四，调查对象的性别与参加文化活动意愿（Y44）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卡方检验不显著。以上四点的具体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 23 与父代相比文化参与意愿变化的显著性群体差异

		参加文化活动意愿（Y44）		
		更强（%）	差不多（%）	更弱（%）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31 人）	24.4	37.4	38.2
	初中（260 人）	33.1	49.2	17.7
	高中及以上（113 人）	50.4	39.8	9.7
	卡方检验 $X^2=41.869$ ， $df=4$ ， $Sig=0.000$			
外出务工年数	不满 5 年（123 人）	29.3	37.4	33.3
	5—10 年（109 人）	33.9	53.2	12.8
	10 年以上（272 人）	37.5	43.4	19.1
	卡方检验 $X^2=17.686$ ， $df=4$ ， $Sig=0.001$			
流出地发展状况	较好（100 人）	40.0	44.0	16.0
	一般（305 人）	34.1	46.2	19.7
	较差（99 人）	31.3	37.4	31.3
	卡方检验 $X^2=8.877$ ， $df=4$ ， $Sig=0.064$			

四、制约因素：新生代农民工阶层流动影响因素构建

由于发展的非均衡性，注定了只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实现地位的代际流动。非均衡发展理论为上世纪中期兴起的经济学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的提出源自人们在资源稀缺的状态下对如何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以促进发展所作的考虑。由于人类生存的社会、自然条件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统一的资源配置模式显然难以获得有效的资源利用率，为了实现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宏伟目标，采取适度的“偏好”发展策略，将资源优先配置到社会、自然禀赋较好的区域或部门，使之形成良性的合力区，通过

这些有条件的区域或部门优先发展所发挥出的辐射效应与扩散效用，带动落后地区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发展。^①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与紧缺性，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非均衡发展是一个必然存在的现象。如果新生代农民工能够超越非均衡发展阶段而直接跨入到均衡发展阶段，其最为可能的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社会资源具有极大丰富性，足以满足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均衡发展的需要。这种情况一方面与我国的发展国情是不符的，另一方面资源的极大丰富性往往也是经过了非均衡发展阶段才实现的；另一种情况是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发展的效率是很低的，不能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因此，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来说，必然会出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分化。那么哪些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实现地位的代际流动呢？哪些因素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呢？

这一部分首先分析了国家制度性因素、社会结构性因素、家庭先赋性因素、个人自致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制约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借鉴以往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因素（X）这一变量操作化为国家制度性因素（X1）、社会结构性因素（X2）、家庭先赋性因素（X3）、个人自致性因素（X4）四个指标，进而又将这四个指标进行操作化，从而完成了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这样的变量操作化过程，构建一个完整的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并利用问卷调查的数据，对这一指标体系进行描述性分析。

（一）国家制度性影响因素

当前，我国与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相关的制度更主要的是表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更多的是国家人格与理性作用的结果，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作为城乡连接的重要纽带，新生代农民工同时具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重特性，这就犹如中国古代的乡绅一样，乡绅一方面扮演了国家代言人的角色，发挥着“上情下达”的功能，另一方面，乡绅又扮演了社会代言人的角色，发挥着“下情上达”的功能，因此，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乡绅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共同载体。新生代农民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重特性表现在：城市意志可以通过新生代农民工来影响农村意志，而农村意志也可以通过新生代农民工来影响城市意志。但是，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被要求按照城市意志来行动，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就变得“名不正言不顺”。

可以说，制度障碍是当前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最主要因素。根据制度障碍表现形式的不同，可以将制度障碍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显性制度障碍，所

① 金育强，黄玉珍，胡科.非均衡发展理论与中国体育非均衡发展实践[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12）.

谓显性就是说大家一看就能看出其阻碍作用，例如，户籍制度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显性制度障碍。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当中犹如处于“孤岛”一样，不能摆脱“外来”特征，其身份的合法性备受质疑；第二种是隐形制度障碍，所谓隐形就是说很难被大家发现其阻碍作用的，例如，我国的教育制度，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的教育也有非常明显的城乡差异，这种城乡差异使得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社会再生产和文化再生产的作用，这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是极为不利的。现阶段，制度障碍因素主要表现为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二元体制犹如一个“固若金汤”的城堡，这个城堡的中心是户籍制度，外围是教育、医疗、就业等各种各样的制度。对在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城乡二元体制就是一个他们无法进入的城堡。因此，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就变得异常困难。

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课题组将国家制度性因素（X1）具体操作化为国家教育机会公平性（X11）、国家就业机会公平性（X12）、国家收入分配公平性（X13）、国家的社会流动机会（X14）、国家户籍制度阻碍流动程度（X15）五个指标。通过对这五个指标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课题组发现以下三个特征：第一，调查对象对国家的社会流动机会（X14）这一指标的评价是最高的，认为很多和比较多的比例达到了47.2%。第二，对国家收入分配公平性（X13）这一指标的评价是最低的，认为完全公平和比较公平的比例为24.4%。第三，这五个指标的分析结果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在每一个指标中，调查对象选择“一般”这一选项的比例都是最高的。

表 24 国家制度性因素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描述性分析
代际流动 影响因素 (X)	国家制度 性因素 (X1)	国家教育机会 公平性 (X11)	完全公平 (18.7%); 比较公平 (20.4%); 一般 (32.1%); 不太公平 (15.3%); 完全不公平 (13.5%)
		国家就业机会 公平性 (X12)	完全公平 (16.5%); 比较公平 (21.4%); 一般 (37.5%); 不太公平 (14.9%); 完全不公平 (9.7%)
		国家收入分配 公平性 (X13)	完全公平 (11.9%); 比较公平 (12.5%); 一般 (42.7%); 不太公平 (18.5%); 完全不公平 (14.5%)
		国家的社会流 动机会 (X14)	很多 (24.0%); 比较多 (23.2%); 一般 (41.5%); 比较少 (7.3%); 很少 (4.0%)
		国家户籍制度 阻碍流动程度 (X15)	很大 (18.5%); 比较大 (17.7%); 一般 (42.5%); 比较小 (15.3%); 很小 (6.2%)

（二）社会结构性影响因素

在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看来，社区与社会是存在明显差异的，社区更多的是一个共同体，是一个熟人社会。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来到流入地之前，他们是生活在熟悉的社区当中的。来到流入地之后，他们生活在了一个外在的、陌生化的社会，他们不仅与流入地的当地居民并不熟悉，同时他们还能明显感受到流入地当地居民对他们的排斥与歧视。流入地当地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排斥与歧视使得其融入失去了社会基础。污名化理论和标签理论可以很好解释这一现象。社会学家戈夫曼对“污名”现象做了深刻分析，戈夫曼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受损的身份”的核心概念，用于描述遭受污名化体验的人们，被社会他人贬低的社会地位。污名化的目标对象就是由于其所拥有的“受损的身份”，而在社会其他人眼中逐渐丧失其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并因此遭受到排斥性社会回应的过程。^①标签理论往往是与污名化理论结合在一起来说明问题的，给某个群体贴标签往往意味着对这个群体进行污名化的过程。比较而言，污名化是一个动态概念，标签是一个静态概念。两个群体之间互相给对方贴上各种标签的过程就是一个污名化的过程，污名化的过程完成之后这一标签也就从“临时性”标签变成了“长期性”标签，这时污名化和标签就已经“板上钉钉”了。

对于流入地当地居民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进入改变了流入地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结构。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为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对于流入地当地居民来说，他们的心态可以用一句古话来形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下，我国的农村社会更多还是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传统社会特征，而我国的城市社会则已经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现代社会特征。因此，来自城市的当地居民和来自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不仅表现为外在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还表现为内在的价值观念上。

正是这种差异使得流入地当地居民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形成了“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之间的差异。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提出了“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的概念，所谓“内局群体”是居于内核、把持文化表达的群体，而“外局群体”是处于边缘、接受并巩固文化表达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的群体。^②新生代农民工“外局群体”的特征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维度上都有着非常明显的表现：从经济维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明显是要低于流入地当地居民的；从政治维度上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愿不强，政治参与的行动也较少，对于国家政策导向的影响非常小；从文化维度来说，当前社会的主导文化是城市文化，乡村文化处于亚文化地

① 李建新，丁立军.‘污名化’的流动人口问题[J].社会科学，2009（9）.

② 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34.

位，没有“话语权”，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在流入地只能是一种亚文化地位。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的分化日益明显，这种分化主要表现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上。不管是从经济维度，还是从政治维度和文化维度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状况都要明显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是，流入地当地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这种“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的关系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

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课题组将社会结构性因素（X2）具体操作化为流入地社会排斥性（X21）、流入地社会融入难易度（X22）、流入地社会保障（X23）、流入地平等性（X24）、流入地城市化进程（X25）、流入地工业化水平（X26）、流入地市场化程度（X27）七个指标。通过对这七个指标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课题组发现：这七个指标可以分为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流入地城市化进程（X25）这一指标，调查对象对这个指标的评价是最高的，认为很快和比较快的比例达到了 62.1%。第二个层级是流入地工业化水平（X26）、流入地市场化程度（X27）这两个指标，调查对象对这两个指标的评价也是比较高的，正向评价的比例分别达到了 55.8%、52.0%。第三个层级是流入地社会排斥性（X21）、流入地社会融入难易度（X22）、流入地社会保障（X23）、流入地平等性（X24）这四个指标，调查对象对这四个指标的评价整体不高，正向评价的比例分别为 26.8%、33.5%、31.9%、29.8%。

表 25 社会结构性因素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描述性分析
代际流动影响因素（X）	社会结构性因素（X2）	流入地社会排斥性（X21）	很弱（8.7%）；比较弱（18.1%）；一般（50.6%）；比较强（13.5%）；很强（9.1%）
		流入地社会融入难易度（X22）	很容易（11.1%）；比较容易（22.4%）；一般（45.2%）；比较难（13.7%）；很难（7.5%）
		流入地社会保障（X23）	很好（13.1%）；比较好（18.8%）；一般（46.6%）；比较差（11.9%）；很差（9.5%）
		流入地平等性（X24）	很好（11.1%）；比较好（18.7%）；一般（46.0%）；比较差（15.3%）；很差（8.9%）
		流入地城市化进程（X25）	很快（30.2%）；比较快（31.9%）；一般（30.8%）；比较慢（3.4%）；很慢（3.8%）
		流入地工业化水平（X26）	很高（26.8%）；比较高（29.0%）；一般（36.7%）；比较低（4.2%）；很低（3.4%）
		流入地市场化程度（X27）	很高（25.4%）；比较高（26.6%）；一般（37.9%）；比较低（5.4%）；很低（4.8%）

（三）家庭先赋性影响因素

家庭先赋性因素是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重要约束条件。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为从资本因素角度解释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困难的原因提供了非常好的理论视角。家庭先赋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家庭资本的拥有情况，根据布迪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划分方式，我们可以发现：从整体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都是比较薄弱的，特别是那些来自贫困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来说尤为如此。

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课题组将家庭先赋性因素（X3）具体操作化为16岁时家庭收入水平（X31）、16岁时家庭住房条件（X32）、16岁时家庭生活条件（X33）、16岁时家庭债务（X34）、16岁时家庭书籍数量（X35）、16岁时父亲看书频率（X36）、16岁时母亲看书频率（X37）、16岁时父母关系（X38）、父母提供的教育帮助（X39）、父母提供的就业帮助（X310）、父母提供的成家帮助（X311）、父亲的政治面貌（X312）、父亲村干部身份（X313）、父亲外出务工情况（X314）、父亲文化程度（X315）等十五个指标。

通过对这十五个指标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课题组发现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对于16岁时的家庭先赋性因素，只有16岁时父母关系（X38）这个指标的正向评价是比较高的，调查对象认为很好和比较好的比例达到了64.7%。调查对象对其它16岁时家庭先赋性因素的正向评价都不是很高。第二，对于父母提供的教育帮助（X39）、父母提供的就业帮助（X310）、父母提供的成家帮助（X311）这三个指标来说，调查对象对父母提供的教育帮助（X39）、父母提供的成家帮助（X311）这两个指标选择正向评价的比例明显要高于父母提供的就业帮助（X310）这个指标。第三，对于父亲的政治面貌（X312）、父亲村干部身份（X313）、父亲外出务工情况（X314）、父亲文化程度（X315）这四个指标来说，大部分调查对象的父亲是非中共党员（84.9%）、没有当过村干部（86.7%）、外出务工过（53.2%）、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87.3%）。

表 26 家庭先赋性因素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描述性分析
代际流动影响因素（X）	家庭先赋性因素（X3）	16岁时家庭收入水平（X31）	很高（3.2%）；比较高（4.6%）；一般（40.3%）；比较低（23.0%）；很低（29.0%）
		16岁时家庭住房条件（X32）	很好（4.4%）；比较好（5.0%）；一般（43.3%）；比较差（19.4%）；很差（28.0%）
		16岁时家庭生活条件（X33）	很好（5.8%）；比较好（7.7%）；一般（44.6%）；比较差（18.3%）；很差（23.6%）
		16岁时家庭债务（X34）	很少（14.5%）；比较少（13.9%）；一般（43.1%）；比较多（14.1%）；很多（14.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描述性分析
代际流动 影响因素 (X)	家庭先赋 性因素 (X3)	16岁时家庭书籍数量 (X35)	很多(6.7%); 比较多(9.3%); 一般(45.8%); 比较少(17.3%); 很少(20.8%)
		16岁时父亲看书频率 (X36)	很多(6.9%); 比较多(9.1%); 一般(37.5%); 比较少(20.6%); 很少(25.8%)
		16岁时母亲看书频率 (X37)	很多(4.8%); 比较多(6.5%); 一般(37.1%); 比较少(21.6%); 很少(30.0%)
		16岁时父母关系(X38)	很好(45.0%); 比较好(19.6%); 一般(29.0%); 比较差(4.2%); 很差(2.2%)
		父母提供的教育帮助 (X39)	很大(29.0%); 比较大(21.8%); 一般(40.3%); 比较小(6.0%); 很小(3.0%)
		父母提供的就业帮助 (X310)	很大(18.8%); 比较大(15.5%); 一般(46.4%); 比较小(12.1%); 很小(7.1%)
		父母提供的成家帮助 (X311)	很大(29.4%); 比较大(19.6%); 一般(37.3%); 比较小(7.7%); 很小(6.0%)
		父亲的政治面貌 (X312)	中共党员(15.1%); 非中共党员(84.9%)
		父亲村干部身份 (X313)	当过村干部(13.3%); 没有当过村干部(86.7%)
		父亲外出务工情况 (X314)	外出务工过(53.2%); 没有外出务工过(46.8%)
		父亲文化程度(X315)	小学及以下(48.2%); 初中(39.1%); 高中 (11.1%); 大专及以上(1.6%)

(四) 个人自致性影响因素

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中,人的社会化过程肯定存在很大差异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空间条件来说,在不同的环境下,人们接受社会化的内容和过程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从时间条件来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接受社会化的内容和过程是具有非常大差异性的。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能够很好解释个人自致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影响。“场域”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方式,从地域的角度来划分,可以分为“城市场域”和“乡村场域”。同样,“惯习”也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方式,从地域的角度来划分,可以分为“城市惯习”和“乡村惯习”。

布迪厄认为,此场域的惯习与彼场域之间存在着“不吻合”现象。由于场域是分为不同类型或形式的,惯习也不例外;因此,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惯习,把在此场域形成的惯习简单地“移植”到彼场域必然会造成“水土不服”,产生各种“不合拍”现象。一种是“纵向的不合拍”,另一种是“横向的不合拍”。^①“纵向的不合拍”

^① 毕天云.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J].学术探索,2004(1)。

主要是从时间序列上来划分的，对此布迪厄还专门举了一个例子，“在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历史局面里，客观结构中的变迁过于迅猛，那些还保留着被以往结构形塑成的心智结构的行动者就成了守旧落伍的家伙，所作所为也就有些不合时宜，目标宗旨也未免与潮流相悖；他们在虚无中徒劳地思考着，用着那些遗老的方式进行思考，对于这些人，我们可以有充分理由说他们‘不合拍’。”^①因此，在不同的场域中往往会形成不同的惯习，流入地当地居民大部分来自城市场域，其形成的惯习属于“城市惯习”，而新生代农民工来自乡村场域，其形成的惯习属于“乡村惯习”。因此，当来自不同场域、拥有不同惯习的流入地居民和农村居民居住在同一个社区时，这两大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很难避免的。这种矛盾和冲突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表现在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另一个方面表现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

在布迪厄看来，惯习具有场域性，惯习只有在产生它的场域中发挥“如鱼得水”的作用。如果借用当代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里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话说，场域性的惯习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根据“地方性知识”的观念，我们在认识不同社会亚场域的过程中，既要分清亚场域的特殊性，也要注意不同惯习的场域差异性，保持场域与惯习之间的“合拍性”。^②可以说，“城市惯习”只有处于“城市场域”中才能表现出兼容性，才能发挥“如鱼得水”的作用。同样，对于“乡村惯习”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把“城市惯习”放在“乡村场域”中，把“乡村惯习”放在“城市场域”中，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都是必然的。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在乡村这个场域中获得的惯习在城市这个场域中具有明显的不适用性，这也就极大影响了其地位的代际流动。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惯习是在“乡村场域”中形成的，是一种“乡村惯习”，但是，他们现在却处于“城市场域”中，时时刻刻对他们施加影响的往往是“城市惯习”。这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存在很大的问题：一方面，从供给角度来说，虽然流入地一直在想方设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但是，流入地的很多做法并没有得到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地位的代际流动，因为流入地的很多做法都是一厢情愿式的，更多的还是以“城市惯习”的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从需求的角度来说，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一直努力尝试去主动配合流入地的做法，但是，他们已有的“乡村惯习”在“城市场域”中举步维艰。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安土重迁的社会，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人的生存就会面临极大的考验。当然，对于这一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同样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分化现

①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75.

② 毕天云.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J].学术探索.2004（1）.

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场域”与“乡村场域”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同样，“城市惯习”与“乡村惯习”的融合度也越来越高。因此，比较而言，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身上更多融合了“城市惯习”的元素。但是，与第一代农民工一样，其“乡村惯习”的本质特征并没有改变。

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课题组将个人自致性因素（X4）具体操作化为文化程度（X41）、身体状况（X42）、工作稳定性（X43）、工作努力程度（X44）、看书学习频率（X45）、社会交往情况（X46）、参加选举活动情况（X47）、参加组织情况（X48）、参加文化娱乐活动情况（X49）、参加教育培训情况（X410）、城市生活方式喜好度（X411）、城市工作方式喜好度（X412）、城市价值观认同度（X413）、外出务工年数（X414）、留城意愿（X415）等十五个指标。

通过对这十五个指标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课题组发现：对于文化程度（X41）和外出务工年数（X414）这两个指标来说，大多数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是初中及以下（77.6%）、外出务工时间在 5 年以上（75.6%）。剩下的十三个指标可以分为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身体状况（X42）、工作努力程度（X44）、留城意愿（X415）这三个指标，调查对象对其正向评价的比例都超过了一半，分别为 64.7%、73.2%、56.2%。第二个层级是工作稳定性（X43）、看书学习频率（X45）、城市生活方式喜好度（X411）、城市工作方式喜好度（X412）、城市价值观认同度（X413）这五个指标，调查对象对其正向评价的比例分别为 38.9%、33.1%、43.3%、42.7%、47.2%。第三个层级是社会交往情况（X46）、参加选举活动情况（X47）、参加组织情况（X48）、参加文化娱乐活动情况（X49）、参加教育培训情况（X410）这五个指标。调查对象对其正向评价的比例较低，分别只有 16.9%、10.7%、11.3%、12.5%、17.3%。

表 27 个人自致性因素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描述性分析
代际流动 影响因素 (X)	个人自致 性因素 (X4)	文化程度 (X41)	小学及以下 (26.0%); 初中 (51.6%); 高中 (18.7%); 大专及以上 (3.8%)
		身体状况 (X42)	很好 (46.2%); 比较好 (18.5%); 一般 (31.9%); 比较差 (1.8%); 很差 (1.6%)
		工作稳定性 (X43)	很稳定 (20.0%); 比较稳定 (18.8%); 一般 (42.5%); 不太稳定 (10.1%); 很不稳定 (8.5%)
		工作努力程度 (X44)	很努力 (41.3%); 比较努力 (31.9%); 一般 (22.2%); 不太努力 (1.6%); 很不努力 (3.0%)
		看书学习频率 (X45)	很多 (15.1%); 比较多 (18.1%); 一般 (50.4%); 比较少 (11.3%); 很少 (5.2%)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描述性分析
代际流动影响因素 (X)	个人自致性因素 (X4)	社会交往情况 (X46)	很多 (7.1%); 比较多 (9.7%); 一般 (46.6%); 比较少 (22.2%); 很少 (14.3%)
		参加选举活动情况 (X47)	很多 (4.2%); 比较多 (6.5%); 一般 (37.3%); 比较少 (29.8%); 很少 (22.2%)
		参加组织情况 (X48)	很多 (4.8%); 比较多 (6.5%); 一般 (36.3%); 比较少 (28.6%); 很少 (23.8%)
		参加文化娱乐活动情况 (X49)	很多 (5.2%); 比较多 (7.3%); 一般 (43.3%); 比较少 (23.8%); 很少 (20.4%)
		参加教育培训情况 (X410)	很多 (8.5%); 比较多 (8.7%); 一般 (45.6%); 比较少 (22.6%); 很少 (14.5%)
		城市生活方式喜好度 (X411)	很喜欢 (17.1%); 比较喜欢 (26.2%); 一般 (45.6%); 不太喜欢 (6.9%); 很不喜欢 (4.2%)
		城市工作方式喜好度 (X412)	很喜欢 (17.1%); 比较喜欢 (25.6%); 一般 (46.4%); 不太喜欢 (7.5%); 很不喜欢 (3.4%)
		城市价值观认同度 (X413)	很认同 (21.0%); 比较认同 (26.2%); 一般 (41.3%); 不太认同 (7.7%); 很不认同 (3.8%)
		外出务工年数 (X414)	不满1年 (5.6%); 1-5年 (18.8%); 5-10年 (21.6%); 10年以上 (54.0%)
		留城意愿 (X415)	很强 (28.2%); 比较强 (28.0%); 一般 (26.6%); 比较弱 (11.1%); 很弱 (6.2%)

五、解决路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阶层流动的对策建议

通过前几部分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国家制度性因素、社会结构性因素、家庭先赋性因素、个人自致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的，这决定了没有统一的、一成不变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模式，而是要本着“分类指导、分别实施、分批推进”原则提出对策建议。另一方面，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地位代际流动来说，其影响因素是各不相同的，这也要求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来说，必然存在一些同质性因素，这就为我们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对策建议建立了现实基础。对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对策建议，课题组认为以下四个方面的总体性思路是需要把握好的。

（一）通过顶层设计破除制度“天花板”

为了更好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必须要强化制度保障，破除制度“天花板”，也就是做好制度的顶层设计工作，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是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

首先，“造桥”过河，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如果说以前我们在处理新生代农民工相关问题时更多的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现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日益复杂，靠“摸石头”已经过不了河了，因为我们已经由“浅水区”进入了“深水区”，此时，我们必须“造桥”过河，也就是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对于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来说，也就是要加强制度保障。制度保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把新生代农民工比喻成“一滴水”，我们把这滴水随意的放到地上，其结果必然是这滴水很快就会干涸，更不要说是让这滴水流动起来了。那么怎么样才能让这滴水能够流动起来呢？答案就是把这滴水放到“江河”里去，让这滴水在“江河”里顺流而下。对于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来说，制度保障就是“江河”，户籍制度、财政投入、法律制度等制度保障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基本前提。只有构建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很长时间以来，各地都在探索如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试图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切入点来改变城乡二元格局。在这方面，浙江也有过各种各样的探索。例如，2009年开始实施的《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其目的就在于通过由暂住证制度向居住证制度的转变来加强流动人口管理，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浙江又在开始探索“积分管理”制度，根据积分的情况可以享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如落户、就业、养老、子女入学等等。

其次，对于制度的顶层设计来说，必然是有“破”、有“立”的。所谓“破”就是要将原先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制度障碍解构掉，如果不将这一制度障碍扫除，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就是“空谈”。在“破”制度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要遵循“循序渐进”原则。因为，“破”制度容易，“立”制度难。不要急于“破”制度，一下子把制度都“破”掉，而是要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不要让制度体系出现“真空”地带。所谓“立”就是要建构起新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制度体系。在“立”制度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是需要注意的：**一是要遵循“精确制导”原则。**制度并不在多，而在于精。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并不缺乏制度，而是制度并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制度成为了一种“摆设”，并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制度的设计是一项要求非常高的工作，要让制度设计更加精准化，这就犹如对导弹的要求一样，要求精确制导，否则制度的效用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必须要突出制

度设计的精准性，明确制度体系中的每一个制度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取消那些没有效用或者低效的制度，从而能够更为有效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二是要遵循“制度协同”原则。每一项制度都有效并不意味着这些制度形成的制度体系整体是有效的，这里面还存在一个制度组合的问题。这就犹如对于一个团队来说，非常强调团队合作，因为团队合作非常好就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如果团队合作出现问题，一加一就会小于二，甚至等于零，更有甚者就效用会是一个负数。对于制度的顶层设计来说也是一样，不同的组合状态会有不同的结果，制度内部的优化组合对于制度体系能否形成合力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制度的顶层设计过程中，要非常注重制度之间的协同性。

第三，制度顶层设计要处理好刚性制度和弹性制度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制度体系来说，其制度顶层设计基本上是由两大类制度构成的。一类是刚性制度，这些制度内容具有很强的统一化、标准化特征，制度的同质性很强，是不因时间、地点、服务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的。另一类是弹性制度，这些制度内容具有很强的多元化、多样性特征，制度的异质性很强，是因时间、地点、服务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的。刚性制度是弹性制度的基础所在，在制度的顶层设计过程中，首先需要确定一些刚性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再来确定一些弹性制度。刚性制度与弹性制度之间的关系犹如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一样，多样性是建立在统一性基础上的，这体现的是一种“求同存异”的思想内涵。对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制度体系来说，不仅需要确立一些统一化、标准化的制度内容，还需要确立一些多元化、多样性的制度内容，从而使得制度保障能够更好的根据时间、地点、服务对象的变化而变化。

（二）形成“三位一体”参与主体模式

要想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仅仅依靠单一主体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首先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需要有哪些重要的参与主体？首先，政府对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乡连接的纽带，对农村和城市的发展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政府必须要高度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问题，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市民。其次，社区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现实载体。因此，社区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社区已有的资源，为新生代农民工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地位的代际流动提供现实有效的支撑。当然，对于不同类型的社区来说，其所能动员的资源 and 面临的发展环境是存在很大差异的。例如，根据社区在城市中所处的位置，可以将社区分为城市社区和城乡结合部社区。从整体上来说，绝大部分的新

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社区的。可以说，城乡结合部社区是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与生活的“天然土壤”，因为这里不仅找工作的机会更多，而且生活成本也比较低。不同类型的社区应该根据自身的特质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加优质化的服务。**最后，为了更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肯定是离不开社会的强有力支撑的。**社区是起着“载体”和“容器”的作用，但是，社区如果离开了社会的支持，也就失去了其发展的外部保障，此时，社区的“载体”和“容器”作用是难以有效发挥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需要政府、社区、社会等主体的共同参与和通力合作。

对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来说，政府、社区、社会这三类主体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如果这些参与主体共同构成了一间房屋，那么，**首先，政府就是房屋的“地基”，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根基所在。**其遵循的行为准则是公平，侧重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经济层面的地位代际流动，目标是让所有的新生代农民工都可以实现地位的代际流动；**其次，社区就是房屋的“柱子”，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主体。**其遵循的行为准则是效率，侧重的是社会层面的地位代际流动，目标是更加精准、更加有效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最后，社会就是房屋的“屋顶”，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天然保障。**其遵循的行为准则是公益，侧重的是文化层面的地位代际流动，目标是进一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水平。可以说，政府、社区、社会这三个参与主体是功能互补的，三者缺一不可，必须要形成政府、社区、社会“三位一体”的参与主体模式。政府、社区、社会这三个参与主体要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来共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

对于政府来说，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非常重要。包括，**第一，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因此，必须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必须要加大政府对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资金投入力度，另一方面是必须要加大政府对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第二，强化政府的监管作用。**这种监管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必须要加强对相关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管，加强资金利用的公开透明度，使这些资金的效用实现最大化。另一方面是政府必须要加强对相关主体的监管工作，确保其没有越界、越轨的行为。**第三，理顺政府部门间关系。**当前，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上，我国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责界定不清晰、职责相互重叠、职责处于真空状态等问题，从而产生了互相推诿、交叉管理等管理上的混乱现象，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实现地位的代际流动。因此，势必要理顺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界定各个部门对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

流动的职责范围。

对于社区来说，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非常重要。包括，**第一，培育城市社区居民的主动接纳意识。**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现象非常明显，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一个重要障碍。由于生活在同一个环境当中，社区居民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对很多问题的认知和看法。因此，必须要培育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动接纳意识。**第二，提升社区的主观能动性。**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过程中，有不少社区的主观能动性不强，往往只是根据政府的要求来行动，政府有要求的才做，甚至是不能很好落实政府的行动要求，有些社区存在着上面给多少钱下面办多少事的态度。这对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都是极为不利的。社区要有主体意识，应该充分认识到其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上的重要作用，不仅要认真完成政府下达的工作任务，还要积极的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想方设法动用一切能够调动的资金和资源，大力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第三，充分发挥社区的平台和载体作用。**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来说，因为社区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甚至是与其工作也是息息相关。因此，社区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重要平台和载体，是一个切实可行、有效的行动抓手，各种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人、财、物等相关资源都应该汇集到社区，使这些资源形成合力共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

对于社会来说，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非常重要。包括，**第一，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城市融入意识。**从整体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积极性不够，不利于其顺利实现地位的代际流动。因此，首先必须要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切实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积极融入城市的意识。**第二，拓展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的有效渠道。**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城市融入意识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参与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这里面还存在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那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参与的便利性。这种便利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参与渠道是否多样，二是社会参与渠道是否有效。**第三，加大社会组织的参与力度。**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的各类社会组织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过程中的参与度是不够的，没有很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对社会组织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够到位。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过程中，各类社会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存在的一些不足。因此，必须要广泛吸纳各种社会组织的力量，共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

（三）工会应提供动态多元精准的服务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来说，工会支持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载体。我们

知道，在现代社会个人日益趋向原子化，这不管是对于社会治理，还是对于社会融合来说都是不利的。一方面，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原子化状态，政府要想对其实现社会治理是非常困难的，这就犹如一个一个的“土豆”，如果散落在地上，你要一个一个的捡起来是很费时费力的；另一方面，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原子化状态，政府要想让其实现社会融合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形成集聚效应，而是一个又一个单独的个体，此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很难摆脱弱势群体地位。组织体系就犹如一个“麻袋”，通过将新生代农民工放入“麻袋”当中，不仅能够有效实现社会治理，还能有效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也就是解决其地位的代际流动问题。可以说，能否提供一个有效的工会支持体系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来说至关重要。

那么，工会如何更好的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呢？从理想类型来说，工会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的服务内容应该与其对服务内容的需求相一致，也就是说，工会服务内容的供给应与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一致。从理想的状态来说，工会的服务供给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服务需求之间要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当然，完全的均衡状态是很难实现的，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了工会的服务供给与新生代农民工服务需求之间的状态从非均衡向均衡转变，或者说，实现一种次均衡状态。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均衡状态也是相对而言的，均衡与非均衡之间也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现在的均衡并不意味着将来的均衡。因此，其发展过程是一个从非均衡走向均衡再走向非均衡的循环往复过程。为了更好的实现工会服务内容供给与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的均衡，课题组认为，工会在切实发挥其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工会要充分考虑两代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对服务内容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存在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首先，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贡献更多的还是体现在“量”上，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贡献在“质”上有了很好的体现，这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层次和领域就能看出来；其次，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更侧重的是经济层面的融入，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的融入有着较强的愿望；第三，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更多的表现出群体式流动特征，其流动到城市以后更多的是与老乡、亲戚等具有血缘、地缘特质的人群居住在一起，那么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表现出个体式流动特征，其流动到城市以后与老乡、亲戚等具有血缘、地缘特质的人群居住在一起的现象逐渐减少；第四，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更多的是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社区当中，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城市社区的比例在不断提高；最后，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更多的是“候鸟式流动”，那么新生代农民

工更多的是“迁徙式流动”。可以说，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正是这种变化要求工会对新生代农民工服务内容也要相应做出调整。如果把以前针对农民工的服务内容做一个归纳总结，可以归纳为是“消极服务”，因为工会更多的是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工会提供的支持和服务还是非常有限的。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规模日益庞大，农民工群体的特性也在发生着非常明显的变化，这也必然要求工会从“消极服务”转向“积极服务”，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元化和更丰富的服务内容。综上，工会应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为动态化的服务内容体系。

其次，工会要充分考虑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层次差异对服务内容的影响。根据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一般说来人们都有下述需要：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或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①人们的这些需要是分层次的，人们对高层次需要的需求是建立在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的。因此，工会在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服务内容时，不仅要满足新生代农民工低层次的需要，也要满足其高层次的需要，使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得到全方位的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按照层次性往往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满足经济层面的需求、满足社会层面的需求、满足文化层面的需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首先要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问题。结合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生理的需要和安全的需要基本上对应于经济层面的需求，归属或爱的需要基本上对应于社会层面的需求，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基本上对应于文化层面的需求。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工会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服务内容也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将服务内容分为经济服务、社会服务、文化服务。综上，工会应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为多元化的服务内容体系。

最后，工会要充分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对服务内容的影响。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的分化越来越明显，工会对不同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要采取分类的方式，切实解决好不同层次新生代农民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依据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的满足情况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可以将新生代农民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生存型新生代农民工**，这是指那些努力实现经济层面需求满足的新生代农民工。**第二种类型是物质富裕型新生代农民工**，这是指那些努力实现社会层面需求满足的新生代农民工。**第三种类型是精神富有型新生代农民工**，这是指那些努力实现文化层面需求满足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不同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工会在服务内容上要有不同的侧重，具体来说，生存型新生代农民工要侧重于经济层面需求的满足，物质富裕型新生代农民工要侧重于社会层面需求的满足，精神富有型新生代农民工要侧重于文化层面需求的满足。综上，工会应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为精准化的服务内容体系。

① 王思斌.社会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3.

（四）构建科学、合理、良性运行机制

为了更好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必须要有一个科学、合理、良性的运行机制。这一运行机制是否是科学、合理、良性的？这取决于其能否实现两个适应：一方面，**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运行机制要与外部环境相适应**。所谓外部环境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的外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运行机制如果背离了整个外部环境，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不相适应，其对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支持绩效肯定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运行机制要与内部环境相适应**。所谓内部环境是指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社会、文化需求。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运行机制是服务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如果背离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内部环境，与其经济、社会、文化需求不相适应，那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举措也就成为了“空中楼阁”。因此，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运行机制必须在实现与外在环境和内在环境相适应的基础上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良好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明确政府、社区和社会的权责分工机制**。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是政府、社区和社会的共同责任，离开任何一方都会大大削弱政策实施效果。因此，政府、社区和社会要遵循合理分工、协调运转的机制，共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第二，实行国家资金与社会资金相结合的机制**。不仅要加大国家对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资金投入力度，同时还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充分利用社会资金，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提供更为充足的资金支持；**第三，建立“三社联动”机制**。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的代际流动，需要有切实可行的落脚点和抓手，“三社联动”就是将社区支持操作化、层层落实的过程。通过把社区作为平台载体、把社会组织作为落脚载体、把社会工作者作为支撑载体这样一种“三社联动”的创新模式，使得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举措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第四，建立绩效评估机制**。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各项举措的绩效如何是最终的关注点所在，如果绩效不高，那么其它所有工作的价值和意义都会大打折扣，因此，绩效评估机制肯定是不能少的。对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效果方面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机制，从而能够及时发现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并及时加以调整；**第五，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的过程中，监督机制也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资金和政策的运用要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以防止资金被挪用、政策被滥用类似现象的发生，从而使得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代际流动各项举措的效果能够实现最优化。

参考文献：

- [1] Anthon Giddens,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London: Hutchinson, 1973.
- [2] Blalock, Hubert 1991, *Understanding Social Inequality*. Newbury Park, CA: Sage.
- [3] Bourdieu.Pierre,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4] Breen, Richard (Ed.). 2004.*Social Mobility in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5] Dessens, J.A.G., W.Jansen, H.B.G.Ganzeboom, and P.G.M.van der Heijden.2003. "Patterns and Trends in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of First Jobs in the Netherlands , 1930-1995."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66 (1): 63-84.
- [6] Erikson, Robert and J.H.Goldthorpe.1992.*The Constant Flux : A Study of Class.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Oxford : Clarendon Press.
- [7] Featherman, David L.and R.M.Hauser.1978.*Opportunity and Change*.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8] Ganzeboom, Harry .B G., D.J.Treiman, and Ultee, Wout C.1991. "Comparativ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Research 2 Three Generations and Beyond."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277-302.
- [9] Ganzeboom, Harry B.G., Ruud.Luijkx, and D.J.Treiman.1989.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8: 3-55.
- [10] Goldthorpe, John H.2000.*On Sociology : Numbers, Narrativ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Theo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1] Goldthorpe , John H.2005. " Progress in Sociology : The Case of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in *Analyzing Inequality : Life Chances and Social Mobil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h2), edited by Stefan Svallfor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2] Granovetter, Mark.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60-80.
- [13] Grusky, David (ed.) 2001,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Boulder.Colo.: Westview Press.
- [14] Hauser, Robert M.1979. "Some Exploratory Methods for Modeling Mobility Tables and Other Cross-Classified Data." Pp.413-58 i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edited by Karl

F.Schuessler.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5] Hout, Michael.1988. “More Universalism and Less Structural Mobility: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in the 1980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 6: 1358-1400.

[16] Lee, Chul-In, and Gary Solon,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working paper, 2008.

[17] Lin, Nan.1982.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Pp.131-45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edited by Peter V. Marsden and Nan Lin. Beverly Hills, CA: Sage.

[18] P. M. Blau and O. D.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1967.

[19] 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0] 毕天云.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J].学术探索, 2004 (1).

[21] 边燕杰.社会分层与流动: 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2] 陈辉, 熊春文.关于新生代农民工代际划分问题的讨论——基于曼海姆的代的社会学理论[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4).

[23] 段成荣.中国流动人口研究[M].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2.

[24] 高勇.社会樊篱的流动——对结构变迁背景下代际流动的考察[J].社会学研究, 2009 (6).

[25] 金育强, 黄玉珍, 胡科.非均衡发展理论与中国体育非均衡发展实践[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7 (12).

[26] 李春玲.断裂与碎片: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27] 李建新, 丁立军.‘污名化’的流动人口问题[J].社会科学, 2009 (9).

[28] 李培林, 田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J].社会, 2012 (5).

[29] 李晚莲.社会变迁与职业代际流动差异: 社会分层的视角[J].求索, 2010 (6).

[30] 李炜.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4 (8).

[31] 李煜.代际流动的模式——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J].社会, 2009 (6).

[32] 龙宁丽.借鉴与参考: 国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做法和经验[J].社团管理研究, 2011 (12).

[33]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34] 莫艳清, 杨建华.市场转型中的社会流动与内在机制: 1978—2011——来自浙

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浙江学刊, 2013 (2) .

[35] 皮埃尔·布迪厄, 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36] 秦阿琳.从“流动政治”到“移民政治”——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代际变迁[J].中国青年研究, 2013 (8) .

[37] 王处辉, 朱焱龙.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 机制、变迁及现实[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2) .

[38] 王思斌: 社会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90.

[39] 吴晓刚.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J].社会学研究, 2007 (6) .

[40] 吴业苗.居村农民市民化: 何以可能——基于城乡一体化进路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社会科学, 2010 (7) .

[41] 吴愈晓.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J].社会学研究, 2010 (2) .

[42] 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43] 袁方, 王汉生.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44] 张宛丽.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机制探讨[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4 (8) .

[45] 张翼.家庭背景影响了人们教育和社会阶层地位的获得[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0 (4) .

[46] 周怡.布劳——邓肯模型之后: 改造抑或挑战[J].社会学研究, 2009 (6) .

[47] 朱力.从流动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看城市适应[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3) .